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年5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言一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罗四鸽（上海）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晓曦（北京）、张无极（北京）、朱航满（河北）

翻译：陈丹丹（南京）、吴万伟（武汉）

编者按：

无论历史或是记忆，都不一定真实。但这样的非真实性却并不意味着虚无。相反，它是一种敞开，为纷繁的个人史与个人记忆留出了伸展腾挪的空间。从而，在纪念日来临之际，“个人”与“集体”两个纬度的交汇，成为了我们回忆与凝视的路径。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航满
思想：成庆
文史：王晓渔
音乐：言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飞：二十一年林夕
孙骁骥：“偏离轨道”的《纽约时报》
刘柠：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书评

罗四鸽：康诺利的反叛与回归
朱白：一部废话构筑的肥皂剧
王晓渔：小天使在看着你
羽良：时空交错下的“张冠李戴”

万象

汪伟：后门
苏小和：更加重要的概念被我们遗忘

随笔

成庆：一个钢琴家的抗议

飞鸿

小谷：来函
王晓渔：回函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ETY 经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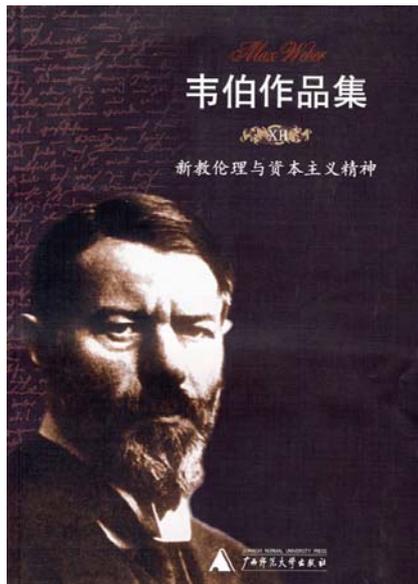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无论哪一门学科, 对于一个刚刚入门同时又有一些思考能力的后学而言, 他总是愿意在观点的层面上, 试图与他人展开辩论, 并为此面红耳赤。这正是我过去一段时期的学习姿态, 以为自己发现了终极真理, 但不久就会发现, 我在某个夜半时分冒出来的观点, 多年以前早就有人为此夜不能寐, 并制造出了一份份结实的文献。

《圣经: 传道书》说得多么好啊!

“已有的事, 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 后必再行。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 哪知, 在我们以前的世代, 早已有了。”

一群读书人在北京成立了读书沙龙, 几个经济学的博士挑头, 逢双周就一本经济学经典讲座, 讨论。承蒙博士们看得起我, 拉我入伙。我当然是门外汉, 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听众, 就已经很不错了。有意思的是, 每次讲座的时候, 总是有人跳出来在观点的层面发难, 总是有人为了一些小的分歧争论得没完没了, 个别时候甚至恶语相向。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兄弟, 我也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思考, 为了更加迅速地靠近真理。但现实的结果是, 我们陷在了简单的观念之争, 不再有精力进入细节和文献之中。所以, 过了几个星期, 总算有人提出, 读书会应该进入经典著作的框架, 进入文献, 进入学术模型, 进入与此相关的中国问题思考, 那种在观念层面反复纠缠的争辩, 需要适当地克制一些。



做一名好的读书人, 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人都仅仅站在这个世界的某个细小的局部, 没有人最终能穷尽这个世界, 即使是那些我们奉为经典的大师, 也只是在某一个侧面看见了真理。现实就是如此, 越是懂得敬畏的学者, 越容易宽容, 越宽容的学者, 越容易看见真相。看来, 敬畏可能是读书人需要建立的重要品质之一。

怎样才有宽容之心呢? 这些年我一直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内版本很多, 为避免看到劣质版本, 请参考王晓渔先生的相关文稿), 很长时间都觉得那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道德建构, 或者觉得那不过是西方的一种文化传统。现在看来, 我忽略了韦伯思考背后的信仰品质, 那种由信仰内生出来的敬畏、宽容与共和精神。是的, 真正的宽容, 需要信仰的力量。在神眼里, 每个人都有罪, 每个人不可能靠着自己抵达完美。所以神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耶稣以他的身体和血液来替我们赎罪, 由此, 神原谅了人。这是神给我们提供的一种宽容的最高范式, 形成的一种终极智慧。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镜像, 都只有相对意义。所以耶稣说, 你们首先要爱神, 然后才能爱人如己。所以主祷文里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从来不掩饰我的信仰, 我是一名基督徒, 我承认我的有限性, 承认我的罪性。我撒谎、我嫉妒、我脾气暴躁, 我目中无人, 我渴慕财富, 我还贪恋女色,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是的,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甚至可以说是人活着的世俗动力, 是人性, 但谁能否认, 这正是我们悲伤和愁苦的源头。我也承认, 即使我受洗之后, 我仍然在罪的试探面前彷徨, 但我必须强调, 借着神的光, 我比过去宽阔了许多, 安静了许多。大家都知道耶稣曾经说过, 上帝的归给上帝, 凯撒的归给凯撒。可是有几个人最终能真正懂得耶稣的良苦用心? 耶稣生活的时代, 以色列人几百年来遭受罗马人的殖民统治, 强大的罗马帝国主宰了犹太人的生活, 犹太人只能躲进信仰里, 凭着旧约启示, 等待基督的拯救。但是, 当耶稣基督真的来临, 甚至当耶稣在犹太人面前行出了很多神迹, 犹太人突然发现, 他们期盼几百年的耶稣, 不是来帮助他们驱赶罗马人, 也不是来仅仅做犹太人之王。耶稣的使命, 是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爱所有的生命, 这包括了犹太人恨之入骨的罗马人, 也包括了你和我。耶稣的理念完全超越了我们熟悉的世俗利益之争, 民族之争、党派之争和国家之争。他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了我们的意念。

这正是十字架的意义。在看得见的二元利益分割面前，耶稣选择了在那个著名的交叉点上被人钉死，从此，爱沿着不同的路径释放。即使在血腥的战场，人们也能凭着十字架的勇气，不分敌我，去拯救所有受伤的人们。想想看吧，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是人都会坚持自己，是人都以为自己应该拥有某种正确的暴力，是人都排斥异己，是人都心存仇恨。只有神对这些利益之争不屑一顾，他只热爱生命。这是怎样的一种救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愁苦虚空的人们不来读一读《圣经》。我们可以选择不过一种圣洁的教徒生活，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一种至高的智慧、一种全新的方法论。

是的，我愿意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建议大家有空读一读《圣经》，神会让我们跳出二元判断，看得更远。

比如凯恩斯，这位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段时间似乎成为自由主义的敌人、市场经济的敌人，甚至是专制政府的帮凶。许小年说，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张维迎说，要埋葬凯恩斯主义。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几乎同时表达了对凯恩斯主义的警惕，究竟是什么用意？

感谢克鲁格曼，他的中国之行于我是受益匪浅。在短暂的面对面请教之后，我开始阅读他的新书《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 2008 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2009 年 3 月第一版）。这当然是一本试图扫描经济危机历史的书，从上个世纪初期的美国大萧条开始，作者的分析黄扫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挖出日本的病灶，然后又嘲笑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短视与愚蠢。一直到今天，这场仍然在蔓延的经济危机，成为克鲁格曼的最近关注案例。在这样的历史流变之中，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克鲁格曼和那些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捍卫者在援引数据，史料，在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之时，焦点几乎一致。而对政府的批评，尤其是对格林斯潘的批评，更是异口同声。只有在如何理解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双方的分野才开始显露出来：

关于凯恩斯，克鲁格曼如此说道：

“在 1930 年 12 月，当事态变得明朗，即美国已经陷入一场罕见的大衰退时，凯恩斯试图像公众解释这场萧条的起因。他宣称：我们的交流发电机出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十分激进，因为凯恩斯其实是在宣称，美国的经济引擎将不会自动重启，而是需要由政府来激活。但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说这话的凯恩斯是一个保守派，因为他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引擎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通过一种技术性的修理就能解决。”

怎么理解凯恩斯这些话的价值？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凯恩斯时代的宏大背景。对人类历史而言，那时一个迷惘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有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西方惟有转向一种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才能摆脱大萧条。这甚至包括了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罗素，以及我们热爱的胡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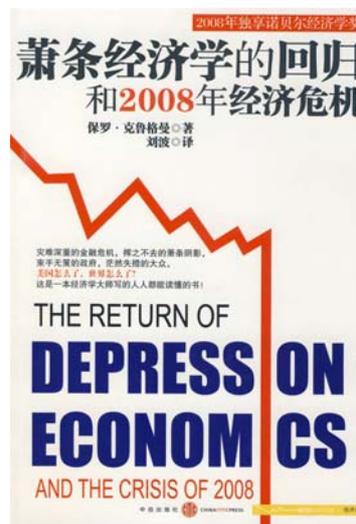
我在余英时先生的著作《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 月）的 23 页读到：

“奇怪得很，他（罗素）说苏俄的 dictatorship 办法是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的。他说，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闹得稀糟，远不如 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胡适之）说，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他说，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

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便是罗素，即便是胡适之，在当时当地，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对天赋人权的信心，对自由的信心，也是一种小信，一种犹豫，一种失望。只有凯恩斯响亮地提出，资本主义并没有走上绝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修理好，要捍卫我们的自由权利，仅仅需要一种十分有限的干预，这种干预一点都不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私人决策。

显然，我们的历史成全了凯恩斯。在市场经济，自由理念一片萧瑟之中，凯恩斯开出的药方真的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复兴使得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重新树起了信心。而当时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使得人们确信，宏观经济干预，尤其是以削减利率或者增加预算赤字来对抗衰退的办法，可以使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在基本充分就业之下，大体保持稳定。

说实话，对于一个视自由和市场为空气的人而言，我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策略有一种本能的不认同。因为古典经济学坚定地认为，政府必然要经过私人利益的过滤，这意味着政府的干预有可能越过自由的底线，最终形成一种对人的奴役。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事实上就是政府干预过度才得以形成。



为了解开我内心的纠结,我开始阅读凯恩斯那本诘屈聱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4月)。以我的准经济学爱好者的专业积累,我显然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公式,那些天书一样的数学模型。但有几个问题我终于清晰起来:



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拯救方案,他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

凯恩斯其次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

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人类的命运,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现在我相信,我们这些自由主义的守望者,从来就不是凯恩斯的敌人,事实上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是那种鼠目寸光的二元判断阻碍了我们的认知。

由此,当我们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问题,我们会面对一系列窘境。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以自由和生命尊严做底线的政府吗?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志存高远,心系未来的政府吗?我们的政府是一个真正尊重市场,倡导充分竞争的政府吗?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有至高敬畏、同时又爱人如己的政府吗?

我心有答案,我不会说出。但我由此理解了许小年教授的话,他说,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这个主语用心良苦。我也理解了张维迎教授的话,埋葬凯恩斯主义,是的,在中国,这可能是一种决绝的姿态,有一些愤怒,有一些着急,但扪心自问,当张维迎看清了真相,他除了着急,除了发出一种情绪化的呼喊,作为一介书生,他还能做什么呢?

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到像余秋雨那样。这位最耀眼的大师,满嘴的文化,满眼的泪水,那么忠诚地热爱政府,那么热切地呼唤稳定,就是没有对生命的怜悯。在政府管制和灾民情绪之间,有没有一种更高的价值需要被我们关注?当然有,这就是生命的宝贵与尊严,每个人活着的尊严和死去之后的尊严。但余秋雨看不到这些,他只能看见某些乌有的“别有用心”,只能看见社会的稳定。他的所谓文化,必然是一种专制的面膜,是一种帮凶。怪不得无论是文革,还是当下,余大师总是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呵呵,怎么扯到余秋雨身上去了!让他和王做鬼为伍吧,我们看顾好我们的尊严,保存好我们的自由,继续朝前走。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特约撰稿人 朱航满(石家庄, zhm7976@126.com)



《孤岛访谈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原为1997年黄集伟为北京文艺台所主持采访的一个节目,其内容是让每一位嘉宾选择一本书和一首音乐到一个虚拟的孤岛上,总计有25位作家、学者、编辑和教师到他所虚拟的孤岛上做客,非常有创意,可惜此书没有附带录音,那样会更有价值。我不知道黄集伟的这个“孤岛”创意缘何而来,细读其书只知道所谓的孤岛是一个非常模糊而有趣的设想,大约就是所邀请去孤岛的朋友前往的是一个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地方,但那里缺乏现成的精神生活,因此前往那里的知识分子们有必要选择一本书和一首音乐,然后在孤岛上等待营救者的出现。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发现各位嘉宾的回答均是缤纷多彩,充满了奇思妙想,而我特别注意到这25个嘉宾在回答这个选择的时候,大多都是充满了向往,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可以完成自己在烦躁喧哗中所不可能实现的阅读计划,有的为能够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时间去与大自然进行一次亲密接触而充满期待。但我注意到作家王小波对于这样一个假设则是充满了一种冷静的反应,在他以为到这样

的孤岛就是要“熬时间”，因为那是一个丧失自由的地方，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可是去了就出不来了，因此他才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反应：“好像丧失自由似的——我还是不喜欢到一个丧失了自由的地方去呀！”

与王小波类似反应的是朱正琳，他虽然没有王小波那样敏感与激烈，但还是对这样一个假设充满了疑问：“‘孤岛’已经是一个限定，可我不知道我去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去度假呢？还是去静思默想一段时间呢？这个心态不同，所带的书就有所不同。还有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你要让我到那儿去住几年，可能任何人都会觉得难受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想这与他自己的生命经历有着重要的关联，在这次关于孤岛的访谈节目中，他就轻描淡写地谈到这样一段独特的生命体验：“我是有过单独被困在一个地方孤独相处的经历的。”并将孤岛上可能的生活状态与他的这段经历进行了一些有趣的比较。如果读过朱正琳的个人自传《里面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月出版），大约就会清楚这样一段独特经历，那是朱正琳因为读书而付出的青春代价，起因是在那个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里，由于到图书馆里偷书来读，被意外抓到监狱关押起来，从而才有了这样“孤独相处”的经历，这是我读过的一册关于“里面的故事”写得极克制与细腻的一册书，可惜的是，他在“里面”并无书可读。能够在“里面”享受读书的待遇，估计是一种奢侈的行为，高尔泰在《寻找家园》（网络增订版）中记自己在成都的监狱中争取读书读报的权利，后来幸好有一位曾做过右派的监狱长的同情，才终于可以让妻子带书来读。写作此文前，恰好闲翻谷林先生的《书边杂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其中引用了他读《聂绀弩还活着》（姚锡佩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中关于聂老在狱中的一个片段，这篇由聂的狱友李世强所写的文章中写到，聂在囚室中，把《资本论》读了四遍，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竟将狱友李世强的学习兴趣也给唤醒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底的一天傍晚，已经入狱四年的聂被提了出去，接着另号收禁，原来聂终于被宣判了，定为无期徒刑。那个夜晚，李一夜无眠。第二天天一亮，因为值班战士的通融，李得以看到聂，才得知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聂对李说：“这没什么，不要管它了，我正有事要找你。《资本论》四卷，我又看了一遍，昨晚我又想到几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夹在书里了，你先拿去看看……”



面对孤岛这样的一个假设，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生命想象，王小波会想到他辞职后一个人在北京独居写作的日子，朱正琳会想到他在“里面”的独处，而李银河会由此想到他刚到美国去留学的生活：“一个人在那儿读书，你很难进到人家的社会生活或是文化生活里去。人家各有各的圈子。另外就是，美国是一个很不重视亲情的国家。他们跟你见面熟，一见面就非常热闹。可实际上真朋友是很难交的。所以，就感到很孤独。”由此可见，孤岛其实并非是虚拟的，他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生命体验当中，身处异国他乡，漂流海外也同样是一种身处孤岛的感受，印象很深刻的是北岛在《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中对于这种体验的描述：“中国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独，那深刻的孤独。人家自打生下来就懂，咱中国人得学，这一课还没法教，得靠自己体会。”《失败之书》是北岛流放海外的一册散文集，记录的是一个诗人颠簸动荡的流浪生活，以及内心孤独无依的精神生活碎片，而这种孤独是每一个游子所必须亲身体味的。与北岛的相似，是近来读刘再复的《红楼梦悟》（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月），这册书正是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文学评论家在海外平复孤独所酝酿出来的著作，刘再复说，他在海外随身都带着一册《红楼梦》和一册聂绀弩的文集。在美国那个叫做科罗拉多的小镇上，这些著作使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日子。

作家卢跃刚在面对黄集伟的提问时，则是想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这样描述自己青春期的精神生活：“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在一个与世封闭的环境里生活的。我当过地质队员，干过四年专业地质，在野外，在帐篷里面，虽然不是一个人，但基本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应该说，实际的孤岛也罢，心灵的孤岛也罢，那种心境我早已体验过。在那种情况下，要排除孤独感，要慰藉自己的心灵，靠什么呢？就是要读书。”那时是七十年代的中后期，社会文化刚刚复苏，年轻而求知欲望强烈的卢跃刚就直接向上海的古籍书店进行邮购，从而使那个孤独的时间变得不再暗淡无光。对于卢跃刚的回答，我不是惊讶他对于这段生命体验的回味，而是他对于读书作用的直接回应。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读书才真正是他在解决自身精神困境时的最好出路，也是促使其不能够沦落和丧失信心的最后出路。相比卢跃刚的青春孤独，我读巫宁坤教授的回忆录《一滴泪》（远景事业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7月），就深刻地感受到读书对于身处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的巨大力量，巫宁坤先生1949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来报效国家，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会以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遭遇到生命中各种不同的政治运动，人生由此变得灰暗。在那样的岁月中，每每遭遇到那些荒唐的政治斗争，

他便会想到莎士比亚在其剧作中的人物命运，他常常会默念那些经典的台词来为自己进行鼓励和安慰，无论是在东北的劳教场，还是在北京郊区的劳改所，他都感谢自己在困境中能够与那些伟大的心灵相遇，成为照亮他在生命中最灰暗岁月中的一线光芒，他说自己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之中，都会随身带着一册《莎士比亚的戏剧选》和一册《杜甫诗选》，后来他还



从一位难友那里读到了一册《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先生优美的小说世界让他在那充满荒诞和苦难的岁月里获得了暂时的温暖与幸福！

无论是在没有自由的监狱里，还是被流放在异国他乡，或者是在极度荒僻的环境中，“孤岛”都存在于每一个生命的经历之中，其实孤岛更重要的不是一种现实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状态，有些生命即使处于自由的状态之中，但依然画地为牢，处于一种精神的孤岛之中。诸如晚年的孙犁先生，这位独特的革命作家，在他的晚年闭门谢客，甚至到了生命的最后光阴，竟然只是每日枯坐书房，对于来访者均是默然无语。他在晚年写作的读书文字如《耕堂读书记》（大象出版社，2008年9月）中，记录自己在晚年以读古书打发消磨时光的岁月，我读这册读书文集，常常可以发现他在过目的那些古旧的书籍上留下挑剔的眼光，听到他记录下自己无书可读的苦闷与孤独。在他所欣赏与喜爱的书中，有鲁迅先生的著作，有《红楼梦》，有《史记》，这些都是他曾反复读过的文字，但到了生命的最后光阴，他干脆什么书也不去读。由此，我想到朱正琳先生在回答黄集伟的提问时所讲到的那句话：“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孤岛。”斯言极是，信哉！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9月访学时光一晃而过，对国内新书出版状况其实已有些许陌生，但经“独立阅读”同仁督促再三，认为有必要就有限的信息与各位进行分享，就权作是热身了。

在此之前，或许有必要简单分享一下在波士顿的淘书经验。波士顿旧书店不少，有名者如联邦书店（Commonwealth Bookshop）与布拉托书店（BRATTLE BOOK SHOP），而哈佛广场附近更有大名鼎鼎的哈佛书店。联邦书店的书品种最精，但是价格也最贵，稍有满意者，均不下20美金，书虽佳但财力不足，只能少去书店，以免眼馋了。而布拉托书店位处市中心，他的书店外面，常年拜访着数架一两美金一本的旧书，其中以小说类居多，而店内的旧书品种相比联邦书店，要更为杂乱，不过此店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墙上兜售名人签名本的广告，如马克吐温的签名本之类，当然价格不菲，非我等财力承受之范围。值得补充一句的是，布拉托书店的哲学类旧书虽不多，但是时常会有一些精品旧书，比如我就在布拉托书店买过一本《蒙田全集》和1927年版的帕斯卡的《外省人信札》，后者还是此书在加拿大的第一版，不过蒙田全集太过厚重，无法携带，只能送予波士顿的友人。我还曾在此店遇到斯特劳斯的得意门生Christopher Bruell在哲学架前驻足寻书，从此也可见此店的特色了。



不过，我个人的大部分购书经验基本都是网络，亚马逊与ABEBOOKS两个网站是我最常采购的地方。如果有心，你经常会碰到相当物美价廉的二手书，比如我就曾以一美金一本，买下了1972年普林斯顿版的《克尔凯郭尔全集》，而史华泽的巨著《巴赫》上下册也只花了两美金就入手。而许多经典的学术著作，如果运气不错，也可以三、四美金的价格淘到，甚至比邮寄费还便宜。

于我而言，网络购书的另一好处，或许是可以有的放矢。对于我等并无藏书癖好的人而言，直接锁定某本著作要比在书店里漫无边际的寻珍要更为方便。比如我就在这两个网站里基本搜罗齐备了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与海希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大部分重要著作，价格折算下来，和如今飞涨的国内书籍价格相差无几。另外国内比较少见的古典音乐家传记，我也循此方式收集了不少，如瓦尔特·卡尔伯姆、斯塔克、克伦佩勒以及古尔德等人的传记，当然也会感叹，国内对这类书籍的引介，无疑太少太慢。

于我而言，网络购书的另一好处，或许是可以有的放矢。对于我等并无藏书癖好的人而言，直接锁定某本著作要比在书店里漫无边际的寻珍要更为方便。比如我就在这两个网站里基本搜罗齐备了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与海希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大部分重要著作，价格折算下来，和如今飞涨的国内书籍价格相差无几。另外国内比较少见的古典音乐家传记，我也循此方式收集了不少，如瓦尔特·卡尔伯姆、斯塔克、克伦佩勒以及古尔德等人的传记，当然也会感叹，国内对这类书籍的引介，无疑太少太慢。

至于国内近月来的思想哲学类出版物，根据我在书店走马观花的经验，粗粗感觉到，对于西洋哲学的引介潮流和格局，仍然没有太多变化，不过在许多方面已经更为深入细化。如斯勒扎克的《读柏拉图》（程炜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一书，就是图宾根学派的代表著作，这本书的内容相当专业，非专业人士恐难参透，之所以在这里推荐此书，是因为本书所代表的图宾根学派对柏拉图的解读方式所展现出来的哲学视野。尽管近代对于柏拉图的解读受到了施莱尔马赫以及海德格尔的极大影响，但是图宾根学派却要重新回到古典语文学的路径，以训诂、注解、辑佚作为解读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从而把其还原于历史语境中。正是在这样的解读策略下，图宾根学派以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作为颠覆过往解读模式的立足点，强调柏拉图的《对话录》与他在学院内部所作的口头讲授构成了完整的柏拉图思想系统。这种学院内部的新动向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似乎太过遥远，不过简而言之，我们对于古典哲学的追本溯源，不仅牵涉到对历史思想人物的还原，其实还和我们当下的时代处境密切相关，如此我们才可建立起古人与当下的精神联系，否则任何单向的历史重建，都只不过是冰冷的回忆而已。

德国18世纪后的思想发展，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是这么形容的，“德国思想界是为了讲述，即通过新的眼光观察，来自内心和来自世界都有无数事物要讲述”，而他在《历史讲稿》（刘北成、刘研译，三联书店，2009年2月）还说，“法国思想界认知事物几乎只是为了争论”。布克哈特的这一观察尽管看上去颇为粗略，却也算的上轮廓鲜明的描绘。在布克哈特的著作中，这本讲稿并不算重要之作，不过这本简明扼要的西洋史纲要，足以让我们从他的寥寥数句中，迅速定位他眼中的时代精神所在。

比起层出不穷的学术出版物，古典音乐类的书籍比较起来算是捉襟见肘，前几年三联书店的系列出版计划，也因销量的考虑而最终取消。看到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在音乐中》（朱贤杰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3月）能译成中文出版，让我大感惊喜。在世的音乐家中间，能用文字表达出音乐与生命之间深刻关联的人，可谓是屈指可数，而像巴伦博伊姆这样能以生命史与音乐的角度来自述的艺术家，更为少见。前几年国内出版的他与萨义德的对话录，就已经展现出巴伦博伊姆在音乐方面的思辨力度。这本书没有太多的纯音乐性的讨论，更多是关于他的生命与音乐是如何交错汇集的。他在书中说，音乐是逃避人类存在困境的最好方式，单单这句话，就已足够让我们思考再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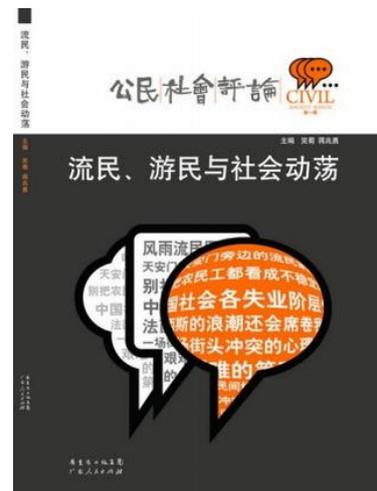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翻检这一月的阅读，多以师友赠书为主。按照“独立阅读”的规则，这里先行声明，以下文字很有可能不中立、不客观。

首先推荐的是笑蜀、蒋兆勇两位先生主编的《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看到这份刚刚诞生的丛刊，仿佛几年前看到《民间》。鉴于《民间》的不幸遭遇，我立即中止联想，并且努力把两者区分开来。如果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差别，《民间》侧重草根，《公民社会评论》侧重精英。这不是什么路线差异，在公民社会里，草根和精英的共同身份是公民。第一辑《公民社会评论》的专题是“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流民和游民引发的诸多历史事故，曾被视为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今天又成为严防死守的对象。以千万计的流动农民和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构成的移民文化，是否会重蹈昔日之路，成为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要摆脱“治乱循环”，必须要实现流民、游民和移民的公民转型。

当下中国的诸多问题，无论是以瓮安事件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还是以杨佳为代表的个体性事件，根源都在于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在公民无法成为公民的情况下，不管你拥有何种户籍，都是二等公民。我们经常说农民是二等公民，这种说法既准确也不准确，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是低于市民的二等公民；但是在公民缺乏应有权利的情况下，农民和市民都是二等公民。杨佳即是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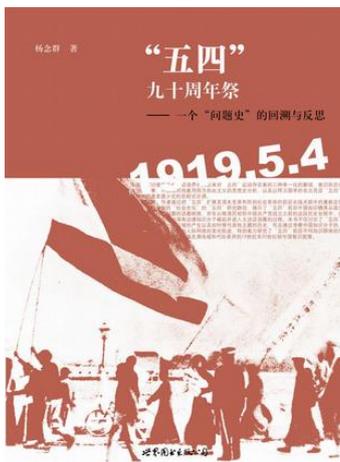
他拥有“首善之区”的户籍，这是电影导演王小帅无法享受的“待遇”，但是，杨佳是一等公民吗？否！在街头推着自行车行走都会遭遇 6 个小时的盘查，怎么是一等公民呢？杨佳是无业人员，那么国家级喉舌呢？据 2009 年 5 月 24 日《新京报》报道，一名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为了获得北京户籍，被一位自称“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的男士招为“特工”，并且写下保证书，承诺“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最终，“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犯有诈骗罪，一审判刑 10 年半。

公民权利的缺失，主要在于制度缺失。非常遗憾的是，市民和农民、移民和土著经常互相指责，认为对方剥夺了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指责中，农民出身的工人（即通常所谓“农民工”）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缺乏话语权，因此常常成为众矢之的，于建嵘先生在访谈中明确指出“别把农民工看成不稳定的因素”，他不赞同将农民工群体和革命传统进行简单嫁接，而是指出农民工常常“以法维权”。从理论上说，“以法维权”优于“以拳维权”，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但是，如何让农民工在现实实践中坚持“以法维权”的路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果“以法维权”动辄面对国家机器的非法处置，动辄面对劳动教养和精神病院，那等于在鼓励“以拳维权”。

在公民社会还很微弱的情况下，媒体和知识界对非政府组织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亦作如是观。但是，非政府组织并不天然地比政府机构更高效、更清廉。2009 年 5 月 19 日《中国周刊》重点讲述了身份暧昧的太阳村，它没有 NGO 的合法注册手续，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通过年检，一方面以资助服刑犯未成年子女为理由进行“道德招商”，另一方面是村长张淑琴拒绝公开财产的详细来源和用途。如果《公民社会评论》在关注公民社会的同时，也能充分检讨其中的问题，对公民社会的成长将更具建设性价值。

2008 年和 2009 年的共同特点是周年纪念日比比皆是。可是，在众多的目力可及的纪念中，宏大叙事成为标准语言，哪怕一个并不宏大的个体，在回顾往事时也往往使用着一套宏大话语。陈家琪先生追忆三十年的系列文章，2008 年在《新京报》连载，后来结集为《三十年间有与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他以具有个人特色的思辨话语讲述自己的个人史，讲述自己对三十年间种种宏大事件的个人理解。比如讲到 1978 年 5 月 8 日《参考消息》刊出雷震致蒋经国的长信，详尽论述了解除党禁、开放言论、维护法制的必要，他这样写：“我把它保留下来，觉得很有价值。”同时又用括号注明：“价值在哪里，自然是不知道。”今之视昔，常常会进入“历史目的论”的逻辑，认为历史的发展尽管有很多插曲，最终的方向却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三十年间有与无》有点像诗人弗罗斯特在《一条未走的路》里描述的那样：“隔了多少岁月，流逝了多少时光，/我将叹一口气，提起当年的旧事：/林子里有两条路，朝着两个方向，/而我——我走上一条更少人迹的路，/于是带来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方平译）讲到最近的 2008 年，陈家琪先生着重提到地震之后的“公共空间或集市”，他这样设想：“如果这个‘公共空间或集市’是思想领域，那又会有多少‘有着非凡胆量和高超技艺的人’得到自我表现的机会，我们在精神状态上所发生的变化会比奥运、神七更令人惊讶！”网络的出现已经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公共空间或集市’不仅限于网络，那种美丽的景象，是如何得让人“不堪设想”啊！

刚刚过去的周年纪念日是“五四”九十周年。去年年底，《天涯》和《上海文化》分别约写与之有关的文章，我觉得有话可说，就应承下来。等到一堆资料放在面前，我却越看越晕眩，“五四”就像一个黑洞，把现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席卷进去。最后，我违背了写作者的职业道德，很惭愧地打了白条，没有兑现承诺。后来，我应一家报纸之约写了一千多字的不那么专业的感想，非常粗略地勾勒了“五四”前后思想从多样到两歧到一元的过程，这篇文章后来被报社“自律”。在知识界的“五四”纪念活动中，最下功力的莫过于杨念群先生，他专门撰写了《“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年 5 月）。针对层累的“五四解释学”，他试图用“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来补充“政治史”或“思想史”的叙事。这种分析方式源自他对“五四”的理解，他认为当时知识精英的关切从政治转移为文化再转移为社会，最后践履型知识群体浮现，随之而起的是社会改造运动。这种历史考察很具现实意义，如前所述，公民社会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运动逐渐成为近年以至未来的重心，这种实践如何从当年的社会改造运动获得经验，又如何与之区别开来，需要认真分



析。在我看来，社会改造运动与波普尔所说的“社会整体工程”有着高度相似性，很容易引向思想改造运动。公民社会如果要与社会改造运动区别开来，首先就要告别完美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这也是我认为《公民社会评论》需要增加对公民社会的检讨和反思的主要原因。

公民社会的前提是明确公与私的界限，它不是要取消而是要更好地保护私人空间。以上阅读主要关于公共问题，我的阅读显然不可能全部集中于此。将近十年前，诗歌界有一个“下半身”运动。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仅仅拥有“上半身”或者“下半身”都是不可思议的。小白先生的《好色的哈姆莱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月），堪称把下半身上半身化的模范文本。他的文章选题篇篇直奔下三路，让人看得胆战心惊，唯恐被低俗，最终却不会面红耳赤，因为文章引经据典，实在是高端得很。小白提到毕加索创作的“347”系列蚀刻画，有二十五幅以前辈拉斐尔和情人的性事为主题，从第三幅起教皇开始进入画面，先是在门外偷窥，随后是登堂入室：编号309是“教皇不见了”；编号310是“教皇回来了，坐在尿壶上”；编号311是“教皇端坐于尿壶上，作其沉思状”；编号312是枢机主教坐在尿壶上；编号314是教皇坐在尿壶上，米开朗基罗钻到床底下。看到这里，我突然产生了考据癖，想考察一下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搬砖的故事”，是否源自毕加索笔下“尿壶的故事”，想来这是小白的特长，就放弃了。看到《好色的哈姆莱特》，我又找出了黄昱宁小姐翻译的《在切瑟尔海滩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8月）。作者麦克尤恩是把上半身下半身化的高手，一对有教养的处子夫妇，如何面对新婚之夜，成为小说的关怀对象。新娘曾经看过一本新婚手册，可是其中的词语让她几乎透不过气来，比如“黏膜”、“龟头”、“进入”。“只要一想到爱德华的睾丸就垂在‘充血的’阴茎——又是个骇人听闻的说法——底下，她的上唇就会噘起来，再想到自己的‘下面’居然要给别人碰，哪怕是她心爱的人，她也觉得恶心，就好像要在她眼睛上做手术似的”——小说在阴茎和上唇、“下面”和眼睛之间穿梭，就像在下半身和上半身之间游走。如果可能的话，这对处子夫妇在新婚之前，应该读读小白的《好色的哈姆莱特》。

MUSIC 音乐

观察员 言一（成都，richard7briner@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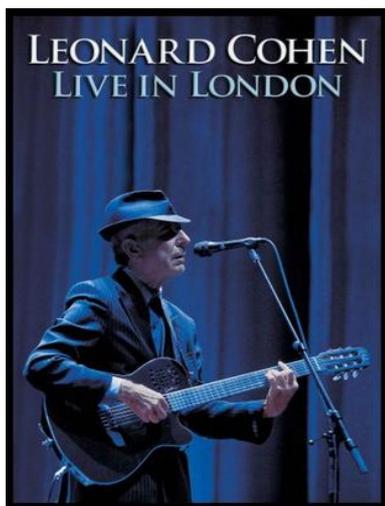
Dylan的新专辑封面初看上去似乎容易让人想起Bon Jovi的上一张专辑，仔细端详之下却引发无数联想。汽车，公路，赤裸的身体，黑白的画面。是否Dylan真的就会驾着这辆车重返那让不少人念兹在兹的61号公路？也许不会。也许方向对于一块滚石而言，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像一块滚石，不断向前（显然，“前”在很多时候无法指明一个具体的方向）；是一如既往地听从于自己的内心，独自看着这个世界。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Dylan会在年及68之时依然写出了

这张《Together Through Life》，而不是选择成为一枚民谣史上的icon。

几乎是在任何时候，我都乐于看到那些老一辈的音乐人发布自己的新作。作为后辈的我，已然错过了与他们，与那个时代一同呼吸的机会。透过音乐听听他们现在的生活，几乎已是所有微不足道但却唯一的弥补。我们只能以当下的方式理解当下和过去。这是一种宿命。

岁月在让人衰老的同时也带来礼物。至少，Dylan不用像年轻时那般刻意去用一把沧桑的嗓音来吟唱。时间已然将他的声线打磨得粗砾，充满张力。哪怕是在缓慢当中，也能造就一番凌厉。重剑无锋。Dylan在《Life is Hard》中的演绎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比他还要老，却也拥有同样迷人声线的男人——Leonard Cohen，这个正处在巡演中的74岁男人刚刚发行了他去年在伦敦演唱会的现场，并且将在结束他的美国巡演之后继续前往加拿大和欧洲。我并不确定是不是所有歌手都希望在74岁之际还能像Cohen一样歌唱；但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可以在74岁时依然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字。

也许，“永远年轻”这个词其实并不适合在摇滚中蹦达的年轻人，不适用于那些抓住青春不放的人。相反，它只属于Dylan和Cohen这样从时间流逝中获得上帝礼物的人。



在我的青春记忆里, Black Sabbath 只留下了几许清浅的痕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几乎对他们一无所知, 无法理解他们的教父级地位。所以, 我不得不感谢这次《Paranoid》豪华双张版的发行——正是在他们的这张经典名作当中, 我被他们的音乐本身所折服, 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在重金属历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尤其是在第二张录音室版本当中所收录的多首 instrumental 曲目, 十分明晰地展现出重金属背后的布鲁斯摇滚根源, 听来十分亲切。而这一点, 多年前的我应当是听不出的, 这几乎又一次印证了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当中的观点: 真正的经典, 也许晚一点遇见更好。

我并没有梳理过 Norah Jones 的成名与王若琳的崛起之间是否有所呼应; 但就像古典音乐中的美女演奏家层出不穷一般, 流行爵士中的女伶亦是数不胜数。问题在于, 如果她们的音乐是一道菜的话, 那么爵士只是作为主打的一种风味, 而不是菜本身。换句话说, 在眼下你很难再找到像 Ella 和 Billie 那样歌唱的爵士女伶。从她们唇齿间吐出一字一句就是音乐本身, 所谓编曲配器已然是其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Dianna Krall 的新专辑既让人失望又给人以期望。

在《Quite Nights》当中, Dianna 恰如其名般地变得沉静, 缓慢; 并且令人吃惊地丢掉了以往以钢琴为主的编曲方式, 把所有的重心都集中到演唱本身之上。我很理解这与这张专辑的选曲主要是 Bossanova 有关, 但也足以让我几乎认不出她来。我所记得的她一直是那个在沉醉中弹唱着《The Girl in The Other Room》的她, 略微暗哑的声线不掩钢琴所营造出的清澈, 冷冽。在她的音乐中, 一直有一种疏离, 令人保持清醒的力量, 而这正是我为之着迷的地方。如今钢琴大幅撤出, 我亦随之迷失, 迷失在她的柔软之中, 找不到支撑点, 只能随波逐流。

只是, 无论是封面还是她的演绎本身都带给人另一种久违但却熟悉的亲切感。这亲切感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呢? 抽丝剥茧, 我想部分当是专辑选曲, 部分则是她越发内敛的吟唱。你能感到有一些东西开始在她身上凝聚, 虽然还未成形, 却让人愿意期待。期待岁月的锤炼与时间的馈赠。尽管最终 Dianna 不可能成为另一个 Ella 或者 Billie, 但想来那时的她必然已足够美丽。

老实说, 这样一系列的聆听是极易令人沉迷的。沉迷于这些老人过往的岁月, 沉迷于那些想象中的美丽。进而, 我开始疯狂地爱上那些在摇滚音乐节的现场给自己耳畔别上一朵小花满脸雀斑的女孩, 爱上那些穿着夹克和牛仔头发蜷曲脸部有着坚硬线条的小伙儿, 爱上他们相互之间的拥抱, 爱上他们静静地坐着看着彼此或者远方, 从另一个世界。我其实也明白, 我只是爱上了他们的纯真, 那个时代的纯真。然后开始感到心扉的疼痛, 开始憎恨自己的时代。可是, 也终究记得: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的名言, 就这样被陈珊妮和陈怡文在《双陈记》里以一种颇具血性的方式唱了出来。在把专辑拖进播放列表之前, 我对陈怡文一无所知。而在听了专辑之后, 我花去了大半个晚上看她的演唱。尽管在她身上依然沾染有某些我所讨厌的这个时代特有的气息, 但她本身的率性与独特的声线便已足够让人喜欢。这该是多么美妙的“双陈记”啊! 陈珊妮坦言, 如果没有陈怡文的歌声壮胆, 也许她无法完成《双陈记》的录制, 而在她们的音乐中, 陈珊妮的冷静内敛则恰到好处地烘托出陈怡文与生俱来的朋克气质, 令它在激进的电音节奏中锋芒四射。我想这应该是我近两年内听过的最为优秀的 EP。

或许, 正是 Kimmy (陈怡文) 的出现使得“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陈珊妮而言变得可能; 或许, 正是《双陈记》的出现使得“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我而言变得可能; 或许, 我们都应该记得那些曾经撼动过自己心灵的心灵, 记得“最好的时代”不是简单消费你我青春就能拥有。

要为五月唱片的喷涌找一个解释是困难的——我至今找不到切入的视角; 而相比之下, 要从近期苏打绿的新专辑和钟成虎 (陈琦贞老公, 卢广仲发掘人) 炮轰乐评人事件上看出一些关于“独立音乐”走向的端倪却要容易的多。

几乎是紧接着 EP《日光》的发行, 苏打绿在 5 月之初发行了他们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春·日光》。按照他们文案中所宣称的“韦瓦弟计划”, 这应当是一张展现台东温暖春天的民谣。其中的音乐确乎洋溢着温暖色调。只是, 温暖之下却听不到民谣的简朴, 听不到那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样一种民谣特性的缺失, 原因亦包含在文案当中: “《春·日光》中 12 首精彩的新歌, 乃苏打绿从多年来苏打绿大量从未发表过的创作作品中挑选出适合的主题歌曲, 经重新编写后, 并集结成表达出春天概念的全新专辑。”换言之, 这张专辑的重点其实在于重新编曲。繁复至近乎于“炫技”的配器, 华丽复古的歌词, 以及



吴青峰越发妖冶的演绎，这一切的一切在给苏打绿带来更多“卖点”的同时，也拖着他们与民谣渐行渐远。是什么让作为“独立乐队”的苏打绿选择走上这样的道路？

一方面，自从许多地下乐队渐渐浮上水面，独立乐队渐渐变成主流，商业化运作方式的引入几乎是一种必然，特别是对于处在港台地区拥有成熟唱片业的乐队而言。这直接导致“独立”一词事实上成为了商业 promotion 中的有力标签，失去此前指代某种音乐风格（哪怕是含混风格）的意指能力。另一方面，受众群的变化也正通过市场机制不断地传递出要求改变的信号。王晓渔先生曾经利用豆瓣上所提供的豆友城市分布数据写过一篇分析城市生活的文章。文章灵活的视角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留心豆瓣上的种种细节，开始注意是怎样的人对怎样的音乐或者电影感兴趣。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这样的受众群划分是极为明显的。就苏打绿这样的“独立小清新”而言，喜欢他们的受众正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喜欢一种被我描述为“轻”的文化。在豆瓣上，这表现为大多上传了真人头像及照片，喜欢《入殓师》却未曾看过《联合赤军实录》（一个比方）——这意味着他们对于当下的流行文化极为敏感，渴望展现不一样的自己，希望过有质量的生活。他们选择通过装饰的方式来抵达“独立”，从而民谣的朴素与力量变得没有吸引力，华丽技巧性的东西才是他们的那杯茶。

然而，颇为吊诡的地方恰恰在于，当每个人都渴望展现不一样的自己的时候，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变得选择趋同。这其中的逻辑无比简单：如果你想要抵达独立，那么你首先要做的不是马路上路，而是需要判断什么是“非独立”。不管在康德的时代还是当下，判断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说苏打绿“韦瓦弟计划”的提出，尚且是一种对市场不失风度的迎合；那么钟成虎的声讨文章则近乎赤裸地为“独立音乐”背后的市场运作提供了明证——之所以会出现负面乐评，是因为自己公司无法在那些地区为卢广仲提供财力和人

脉的支持。抛开卢广仲的音乐本身不说，我们不难想见的是今后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由人脉和财力打造出来的“独立音乐”，直到“独立”一词的最初含义被彻底漂白。

必须坦言，我个人更加喜欢那个“独立”没有成为形容词，没有成为标签的时代。那时候，“独立”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生活状态。它很沉重，需要修行才能抵达。这样的时代碰巧被独立导演盛志民用镜头记录在了他的新作《再见，乌托邦》里。通过对崔健，何勇，张楚等人的访谈，他事实上完成了一种个人层面的自我梳理，将探询的触角伸到了独立，自由的各个立面。影片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段回忆，也可以是一扇门。在此，诚意推荐。



《再见，乌托邦》中渴望做主流音乐的小畅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HONGKON 香港

二十一年林夕

特约撰稿人 严飞(美国·旧金山, fei.yan@green.oxon.org)

第一次知道林夕这个大名，是因为梅艳芳演唱的那首《似是故人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幕后的填词作者加创作总监。也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我有兴趣开始注意起这位灵机一动，将简体“梦”字拆开做自己笔名的香港填词人。我知道，粤语有九音，起承转合并不规律，所以特别难填，要填得一出好词更不容易，而林夕被喻为香港“词坛教父”，他的才华和灵性、气质与神韵，真真正正是词人中的词人。

《曾经》是林夕最新的散文集，其实文章都是旧的，是林夕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两年出版过三本书的结合本，都是专栏结集，包括《某月某日记》、《即兴演出》、《盛世边缘》。十六年后，再一次重现在读者面前，读来又有几多对岁月的别样感慨和伤叹。书名叫《曾经》，因为那是林夕 1985 年出道时发表的第一首歌词作品，由钟镇涛演绎，横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让人难以忘怀：

诈装一醉 阖眼一睡
随便我去对待谁
胡乱里 谁顾虑 怎样爱憎

曙光一线 梦里一现
无奈照醒我向前
纵是曾经厌倦所有挑战

曾着意洒脱地胡混
谁料跌了却又要翻身 望满身伤痕
才明白即使嬉笑一生 也常被困



《曾经》共分六章，分别是“一个人的味”、“世纪末荒凉”、“总是牵缠”、“活着自活着”、“此爱”和“感动”，连在一起看，就好像一首时间流转，空间变换的词曲。主人公流离于世纪变迁中繁华的都市会所，内心却一片苍凉寂苦。为了生计和未来，辛劳并坚持、执着并专心，在一场关于梦想的旅行中充满期待着前行。

事实上，曾经的林夕，从香港大学文学院毕业之后，任职过大学助教、报馆、电视台，同时为报纸杂志撰写七个专栏。当罗大佑与群星共唱《明天会更好》，崔健吼出第一声《一无所有》的 1986 年，林夕通过参加歌唱比赛负责填词部分辗转入行，正式晋身为专业词人，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于蛰伏中等待机遇的垂青，可以说是“个中多少苦，谁解其中味”。1989 年，两首同为林夕填词的作品——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和谭咏麟的《八十以后》互相比较冠军榜，林夕才正式为词坛所瞩目。90 年代初，林夕与罗大佑合作，加盟罗大佑音乐工厂，写出了一批批古典诗意与现代词汇相融合的名词佳作，正式奠定其香港填词界教父的地位。迄今为止，在 21 年的填词生涯中，林夕创作了将近 3000 首词章，获得了无数次大奖，也同时造就了一个通过一己之力更新华语乐坛的神话。在这个神话里，有林夕的罗大佑、林夕的张国荣、林夕的王菲、林夕的黄耀明、林夕的陈奕迅……

林夕的歌词，以对事物观察入微，对生活体味别致而著名。他的散文，虽然所涉及到的题材有些杂乱，但风格亦是如此，都是从小眉小目的身体语言和都市琐事出发，利用其丰富的文学修养和创造力营造情感的冲突和张力，展现他既含蓄又大胆，既细腻又澎湃的感情世界。从这本书中，可以随手采撷到类似的文字：

“如今每天都听达明一派的‘伤逝’，简明重复的音符，回音校得很大很大，调子很低很低，令我想起痛苦可以很美丽”（《伤势》）；“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婴孩在怀抱，母子二人正奋勇在地铁月台上转车，在地图上由一条支线跳到另一条支线之际，忽然失足向前仆倒，母亲并不气馁，第一时间挣扎起来，没事人般又向前跑，迟了恐怕车门关上，迟了恐怕来不及冲最好的奶粉给婴孩充饥”（《地铁母子》）；“划根火柴，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点根香烟，看它能支持多久久的寂寞。斟一壶茶，在被遗忘的人生角落。须要抓住一些什么，证实语言和文字的分别”（《什么》）；“在这枯涸焦灼的夜，一倒下去便是无边荒凉无限荒废的睡眠。茶不再是茶，肉体需要它的时候，我便忘了茶的笔划”（《茶》）。

林夕在书中提及他当时的文笔风格“有点临摹李碧华加亦舒”，有舆论因此而评论，就整本书而言，林夕此言不实。亦舒的文字明快干脆，观点独到犀利，李碧华的文字凄艳华美，深浅处皆蕴涵哲理。比起写词的林夕，他的散文文句过分琐碎散乱，隐晦难懂，感性的成分常常细微至末，宣泄而出，和李碧华、亦舒对比起来，总感觉有不少距离。然而，正如林夕在书中自序而言：“（这本书）充满了私人日记的贩卖，主要是对这个世界杂架摊（波仔：这个杂架摊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问了香港人也不知道，但是原文抄于这本书）的眉批，你可能不同意，但希望你会因更加了解我而了解我见的世界；也有些在大学宿舍生活的感受，你可能没有，但我希望看过后你会感同身受”。

是的，我们不应该去苛责当时那个初出社会做事，并刚刚开始娱乐圈为写歌词忙得千帆并举的青涩作者。我们应该庆幸，在十六年后的今天，可以通过阅读这些一字不易的文字，看到一个会为了身边琐事而触发敏锐情感的真实作者，这才是本书最弥足珍贵的地方。

因为从今时今日往回看去，那些个过往和记录，都只是曾经。

林夕：《曾经——林夕 90 前后》，皇冠书业，2006 年。

AMERICAN 美国

“偏离轨道”的《纽约时报》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詹姆斯

在 9·11 事件的第二年，74 岁的詹姆斯博士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反战文章《谁是国际恐怖主义者》。这位以反对美国政府著称的语言学教授，在美军以武力屈服并进入阿富汗驻军之际，依然不忘给这场“反恐战争”泼一瓢冷水。他提醒合众国的公民们，即使举国刚刚罹受灾难，即使在面对所谓的“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之时，每个人都应该理性地审问自己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对恐怖分子的定义是什么；其次，什么行为是对于恐怖分子罪行的合理回应。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判定，必须建立在一种适用于世界各国的“通则”之上，否则，他说，当讨论一场战争是否为“正义”的时候，民众便没有必要把那些“甚至不愿具有这种正直的人”所说的话当回事。

我想，詹姆斯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新闻立场的“客观性”问题，因为我们对于任何公共事件的获取与讨论都不得不依托于媒体的平台。原初的“现实”在经过了媒体的层层筛选、量化、重组、复述之后，其“磨损度”如何？或许我们都还记得麦克卢汉的教诲“媒介即讯息”，但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媒介自身的局限往往也会对其披露信息的真实性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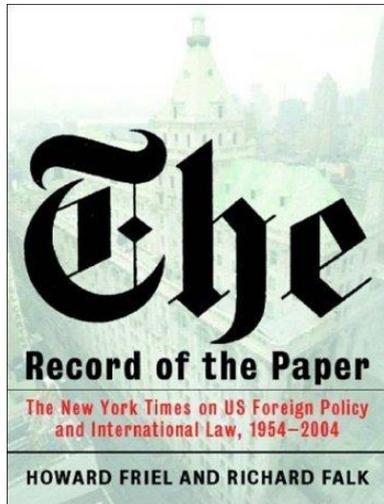
类似的“局限”包括很多。以报纸为例，报刊的发行周期、对自身读者的定位，特别是办报的核心理念都会对那些印刷在四开或八开纸张上的铅字“现实”产生影响，有时，这不过是对某些事实观点的“左右微调”，而有时，这种影响的剧烈程度竟也能够达到颠倒黑白，一纸瞒天，乃至林肯所谓“欺骗多数人于暂时”的地步。

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时期，英国《独立报》的记者罗伯特·费斯克曾关于美军对伊拉克中部的希拉（Hilla）城非法使用集束炸弹有过详细的描述，“那些录像过于恐怖，不适合在电视上播出，那些通讯社驻巴格达的编辑只能从长达 21 分钟的录像片中剪辑出几分钟来播出，原录像片中有一位父亲手持已成碎片的婴儿尸体对着摄像机大喊：‘懦夫，懦夫’……”

关于“像葡萄一样”扔向伊拉克平民头顶的集束炸弹的报道，在各国媒体中并不鲜见。路透社、加拿大通讯社、《金融时报》、《亚洲时报》等等对此都有连篇累牍的报道，但唯独在战争的发起国——美国的媒体中，此种内容少之又少。相反，作为全美最著名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驻巴格达分社主任约翰·伯恩斯在乘车前往希拉之后却自信满满地在报纸上写道：眼前发生的悲剧和惨象，只是伊拉克政府用来证明“美军无差别地滥用武器杀害伊拉克平民的铁证”，而事实上，他“很难把医院里听来的叙述与所谓的袭击发生现场联系起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然是违背事实的谬报。不仅是谬报，美国对希拉及周边地区使用集束炸弹的行为违反了 1949 年通过的《关于展示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铁定构成“战争罪”。约翰·伯恩斯对于既成事实视而不见的言论也被外界批评为“用人性换取在《纽约时报》的任职”。

就在几个月前,《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朱迪斯·米勒却做了一件与约翰·伯恩斯完全相反的事: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凭空想象出了一系列伊拉克“核原料堆”和“生物武器”试验的新闻报道,依靠自己从未亲见的“布什政府的匿名新闻线索”以及“伊拉克匿名科学家”的“采访”,专家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拉克领土内就像埋在地下的石油一样成了无需证明的事实。但当《新闻周刊》采访叛逃的伊拉克前军事工业部部长时,对方却表示,



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就“销毁了所有储存的化学、生物武器”。实际上,自从新闻造假的“惯犯”杰森·布莱尔的所作所为被曝光之后,一项调查报告就曾警告《纽约时报》:“不能允许无法确认的新闻线索在报纸上碰运气”。按道理本应被报社“内部处理”的米勒,此刻却安然无恙,命运与自己的“前辈”布莱尔有天壤之别。

无论米勒再“创作”出多少稿件,她始终不会成为布莱尔第二。这不是说《纽约时报》有着双重标准,而是因为造假成性的布莱尔不幸在报道国内新闻时犯了众怒,作为有着150年历史的《纽约时报》自然必须杀鸡儆猴。而米勒炮制的系列“匿名”报道刚好处于伊拉克战争这个节骨眼上,《纽约时报》此时如果公开米勒的不实报道无疑等于间接否认了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而这,恰恰又违背了《纽约时报》的“非抨击性”原则。

关于“非抨击性”原则,霍华德·弗里尔和理查德·弗尔克在合著的《〈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一书中曾引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日后的总编辑亚瑟·格布在最初进入《纽约时报》之时,曾经对报社的自助食堂重新加工剩菜的事件做了调查性报道,准备将“成果”刊登在内部简讯上。然而,当时的发行人苏尔兹伯格在调查一开始就劝说格布收手,并劝告说,“我听说你已约人就食堂饭菜投诉情况写篇报道……你应当了解,我们不是一家抨击性(crusading)报纸。”最后报道也不了了之。

看来,认识到“我们不是一家抨击性报纸”,似乎是每个《纽约时报》记者的必修课之一。19世纪50年代,草创的《纽约每日时报》便确立了“报纸记录”的客观立场。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收购了濒于破产的《纽约时报》,并明确提出新闻报道原则:“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无论涉及任何党派、地域或特殊利益。”

奥克斯主要权衡了两方面的问题,既要做国内外新闻报道的先驱,又不能陷于立场之囿,“不偏不倚”的办报理念因而一直为奥克斯家族的继任者们恪守不渝。但是,正如弗里尔与弗尔克所担忧的那样,奥克斯的徒子徒孙在奉行他的“原教旨主义要求”时,却又被这种思维桎梏了手脚。两位作者写道:“在给其他出版物撰稿时,他们(记者)可以写得流畅、洒脱,而在为《纽约时报》执笔时,由于意识到这种分量,他们变得过于拘谨、刻板和乏味。”由此,当“非抨击性”代替了“不偏不倚”成为了报纸的一种理念时,自矜与骄傲事实上也就开始慢慢代替了寻求新闻真相的精神。

更为关键的是,如今《纽约时报》作为进入《财富》500强的媒体公司,不可能不考虑如何“讨好”自己的读者。“不偏不倚”从一种中立的新闻理念逐渐变成了报道中“既是鹰派又是鸽派”的双重立场。《纽约时报》社论版在2002年9月还提到伊拉克“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并暗中褒扬了布什政府对伊的政策,而在3个月后却评估说“并没有正在迫近的危险”。甚至在同一篇社论里,文章的前后观点竟然也可以互相矛盾。不能触犯的两条底线是,立场上《纽约时报》必须比一些右派报刊更为左倾,但又不能得出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唱政府的反调。

于是,夹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之间,《纽约时报》只得对“联合国宪章”、“国际法”等字眼缄口不提。据统计,从9·11当日到2003年3月21日之间的70多篇社论中,报纸甚至连一次《美国宪法》的概念都没有提到。很显然,人们都记得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的说法,美国对伊拉克的悍然入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而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得到美国批准的国际条约是“全国的最高法律”,所以,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同时还违反了美国宪法。



当然,《纽约时报》对于这样的“违法”其实并不十分在乎。对于国际法的“蔑视”,自冷战时期就源自于乔治·肯南和汉斯·摩根索等人的说教,这种看法认为,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与秩序,将建立在一种“武力制衡”的思维下。美国历史上的东京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都是这种思维的产物。而今天,当看轻国际法的思维被商业贴上了“全球化”的标签时,为读者提供“所有适于发表的新闻”这一目标就越发与“为普通民众服务”的精神相左,而始终纠缠于协调自由派、保守派人士胃口的“定位”战略上。《纽约时报》自然也由“不偏不倚”成为“偏离轨道”的一份报纸。

翻看近日的新闻,相信每个人都不难意识到《纽约时报》正面临着创办150多年来的最大困难。无论是好莱坞权贵大卫·格芬还是谷歌元老人物拉里·佩奇,我想都不足以单纯以金钱“拯救”《纽约时报》。如何在不损害新闻公正性的前提下更新奥克斯的编辑理念,是这份老报今天的编者和读者都需要追问的。

[美]霍华德·弗里尔,理查德·福尔克:《一纸瞒天——〈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彭贵菊、龙红莲译,涂险峰校,三联书店,2009年4月。

Howard Friel & Richard Falk: *The Record of the Paper: How the New York Times Misreports US Foreign Policy*, Verso Books, November 2004.

JAPAN 日本

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举出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活跃,但却因种种地缘政治矛盾和历史问题而频频释放出“地壳活动”信号的地区的话,非东亚莫属(指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义东亚地区)。这种“地壳活动”的原动力并非由于地质年龄上的“年轻”而产生的活跃(恰恰相反,该地区地质学意义上的地层年龄相当古老,同时也是公认的被人类文明覆盖最早的地区之一),而是某种源自历史的张力。

东亚地区无论中、日、韩,都不乏各自或灿烂或沉重的历史及历史观,但缺乏可资共享的对区域历史的共识。换句话说,有东亚历史,而无东亚史观。正如一位参与东亚三国历史教科书共同编纂工作的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彼此对历史问题的最大共识,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同的。”戏言归戏言,但共识缺失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共识的长期缺席,导致审视邻国的战略视野充满误读,在交往过程中误解横生;而误读、误解一旦产生,往往会在由大众传媒和民意构成的“沉默的螺旋”效应的作用下,持续发酵,动辄引发“地震”,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不稳定构造的成因,颇复杂,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那种把责任一股脑都归为日本的战争反省不彻底的做法,其实无不简单化的嫌疑,也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反而会被遮蔽。近年来,日本由媒体主导的重新检讨历史、反省历史的工作颇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发行量动辄数以百万计,甚至以千万计的主流大报,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对舆论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可发挥传媒优势,整合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资源,使大规模、跨国界的历史田野调查及实证性研究成为可能,有助于新史料的挖掘、发现和新观点的碰撞、生成,对学术之功远在学界之上。日媒中的“百年老店”、著名左翼报纸《朝日新闻》继通过检讨自身在战前和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力求发掘从自由主义媒体坠落到战争机器协力者事实背后的发生机制的《新闻与战争》之后,进一步把聚焦的景深投向了东亚的近现代,试图以超越国别史的视角,探索深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

东亚地区“地壳活动”的原动力——此乃《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一书的“野心”之所在。如此学

术性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成功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尝试本身，带有破天荒的开创性，无疑值得评价。遑论其探索无论在史料发掘，还是对诸如区域历史性和解的现实基础的思考上，均有所突破，有些甚至堪称建设性。

史料发掘，功不可没

十个主题，纵横中、日、韩、越，上下一个半世纪，从鸦片战争、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台湾割让，从日俄战争、朝鲜兼并，到辛亥革命、伪满成立，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到国共内战、韩战、越战，从日韩、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韩国的民主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涵盖了一部近现代东亚史。视野如此深广，如果是泛泛扫描的话，势必浅尝辄止，乏善可陈。但著者以结合当下的超越学术的新闻主义视角，在对史料加以精心选择的基础上，深度聚焦，不仅“激活”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材料，而且带出了一批尚不为人知的宝贵史料，有些则是首次曝光于公众视野。使历史的表情更加生动，更像是“活的”。兹举两例试说明之。

国父孙文发动的辛亥革命，多亏了宫崎滔天¹等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在人、财两方面的“无私”襄助，否则的话，会走更长的道路，这早已成为历史定论。但当时参加革命军，帮助中国革命的日人中，还有另一类存在，譬如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革命军并阵亡的日本新潟县柏崎出身的步兵大尉金子新太郎。

据柏崎地方史研究者杵渊武二的研究，金子赴中国后，曾致信妻子，表示“倘若成功，当有再会的机会，否则便是凶多吉少”；而其赴中国参加孙文革命，并非基于军方的正式命令，而是为某个大人物私相授受的、带有某种秘密使命的私人派遣。那么，到底受何方派遣，肩负何种使命呢？这些谜一般的问题，随着金子的一去不返，长久沉没于历史的河床。

直到2007年4月，本书执笔者之一的记者偶然读到辛亥革命时任陆军少将的宇都宫太郎²的日记，谜底才揭开。原来，金子新太郎是受宇都宫的派遣而奔赴中国的。宇都宫在日记中明确记载，作为自己（宇都宫）“个人的事业”，令其（金子）参加“支那”革命军。在交给金子派遣经费两千元的同时，对他亲口下达了“妨害清国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的媾和，在革命军势力圈的中国南部建立独立国家”的训令。对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陆军首脑均未参与，完全是宇都宫个人的私人派兵。

日记中还具体记载了对金子做出的训令内容（“我的私见”）。那是武昌起义爆发5天后的黎明时分，天未晓就醒来的宇都宫，一口气将平时反复考虑的对“支”政策写了出来，试图以自己的方针来主导参谋本部的行动。方针要点为：1、中国之大，不可能一气得到，因此最好分割为若干独立国，加以“保存”；2、由于此次内乱（指辛亥革命），中国有可能分裂为满、汉两个国家；3、表面上帮助清朝，暗中支援革命军，伺机做旨在切分成两个国家的“调停”；4、在此基础上，与之建立保护国、同盟国的特殊关系。毋庸讳言，如此对“支”政策的背后，显然有把日俄战争后到手的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及南满铁道（满铁）变成永久利权的战略考量，此所谓“满蒙问题”。

金子新太郎赴中国后，作为第一步兵日籍顾问官，执行了对革命军的督导。武汉之役，遭卷土重来的清军激烈反扑，革命军惨败，付出了约一万人的牺牲，其中包括47岁的金子。1913年2月，宇都宫专程赴汉阳凭吊阵亡的金子，在其墓前供奉了一瓶白兰地。

后来，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未采纳可能导致与西方为敌的冒险政策，因而宇都宫版的对“支”政策未能兑现。但这件事像一个隐喻，微妙地诠释了日本在“满蒙问题”上念兹在兹、根深蒂固的政策基因，也埋下了后来以极端的方式“一揽子解决”的伏笔。

第二个例子，涉及韩国在越战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朝鲜战争（所谓“朝鲜特需”）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起爆剂的话，越南战争（所谓“越南特需”）则充当了韩国经济起飞的起爆剂。前者是见诸日本历史教科书、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后者则因某种负面因素而长期尘封，直到金大中上台后，才被媒体曝光。

为了践行对友邦美国的“大义名分”和兑现经济实利（前者出于对美在韩战时保护自己的感恩，后者则着眼于战争带

¹Touten Miyazaki (1871-1922)，玉名郡荒尾村（今熊本县荒尾市）出生。本名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自由民权志士，后皈依基督教。1897年结识孙文，开始支援中国革命，倡导并践行“大亚洲主义”。

²Tarou Utsunomiya (1861-1922)，佐贺藩（今佐贺县）出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在参谋本部负责情报工作，陆军内反长州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时，从三菱财阀主子岩崎久弥处得1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的数亿日元）资助，以此为经费在中国大陆展开情治工作。1919年朝鲜“3·1”独立运动时，任朝鲜派遣军司令官。自子宇都宫德马为日本著名政治家、积极裁军论者，力主中日友好。

来的战时景气),韩国在从1964年到1973年的9年间,共向越南派兵32万人,分别编成“猛虎”、“白马”、“青龙”等部队,与美军协同作战,兵力仅逊于美国。

1999年,韩国著名周刊《The Hankyoreh 21》发表了一个关于韩军在越战中针对平民暴行的深度调查:大批越南妇孺老幼被韩军屠杀的报道,令舆论大哗,爆料者是当时正在越南留学的韩国历史学者具秀延。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她估计被韩军屠杀的越南平民至少不下9千人,且杀戮手段之残忍,堪称虐杀,连孕妇和孩子都不放过的无差别集体屠杀,令她感到震惊和羞耻。更重要的是,如此骇人听闻的反人道战争罪行,在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其中,朴为出兵越南的始作俑者,全、卢均为前越战指挥官)连续三届军人政权治下,信息完全被遮蔽,国民无从了解真相。

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曾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受害者的韩国,为什么竟会对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大开杀戒?一个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仇恨:经历过朝鲜战争的韩国军人,是在“共产主义者非人类,必除之而后快”的冷战意识形态中长大成人的一代;加上美国的影响,在开赴沙场前便已执行了“清共”(Red Purge)的洗脑程序。

一石激起千层浪。具秀延的调查,在已实现民主化的韩国社会引发了关于处理战争负面遗产的深深思考和激烈论战,以越南受害者为对象的形形色色的支援志愿活动,至今还在进行时。

构筑东亚史观的可能性

对积重难返的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一个常常被用来比照的地区是欧盟(EU)。战后,在曾几何时同为一对宿敌的法、德两国历史性和解的基础上,欧盟27个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内部已消除了边界。以法、德两国共同编纂的历史教科书第一卷的刊行(2006年秋)为标志,以个别国家为单位的对历史的阐释已然消解。这无疑是战后和解的巨大成就,为国际社会妥善解决历史问题,实现广泛和解昭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摹本。

但是,法、德的和解绝非一日之寒:从1951年,德国历史学者、不伦瑞克大学教授奥尔格·埃克特(Georg Eckert)在英国占领军的帮助下,与旧敌国之间展开历史教科书对话,并就法德史内容编纂问题发表的共同建言算起,到共同编纂版第一卷的刊行,历经55载光阴。历史文化传统相似,战后同属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国家,为实现历史和解,尚且需要如此漫长的磨合,文化传统各异,意识形态、制度差别迥然,国与国之间(中日、日韩及中日韩)的共同历史研究刚刚起步的东亚社会的和解无疑还有相当长的道路。对此,相关国家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一言以蔽之,不同国家间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盘点、整合区内国家共通的历史共识,构筑可资共享的历史观的过程。而东亚史观能否顺利构筑,从而达成基于该史观之上的区域广泛和解,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前途殊难预料。但大体说来,有几个难题是注定无法绕开,必须要面对、解决的:

第一是殖民地化问题。与欧美旧宗主国无不在战后直面其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经历过一番反殖民化的历练不同,日本由于战败后为美国占领、托管的特殊情况,虽然从法理上承担了战争责任(“彻底”与否另当别论),但殖民地(台湾、朝鲜半岛和伪满洲)化的责任则从未得到正面清算,未来在这点上与相关国家的摩擦必至;

第二是区内诸国共通的问题:缺乏共识基础。对战后建国的亚洲各国来说,由于各自的近现代史都是以自己国家的独立为内核来书写,容易流于某种以对旧宗主国的抵抗、挫折、胜利为主轴的历史叙事,而缺少对与邻国及相关国家交流史的关注,从而导致对地区固有历史的认识失之片面;

第三是美国的问题。对东亚各国的近现代史来说,美国的存在至关重要。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区内国家间的主权争端,其根子都在美国。何以在东亚史观中适度体现美国的存在,并在相关历史叙事中实事求是地梳理、阐释有关问题的成因,并提供解决的钥匙,美国的角色重要且微妙。

就东亚社会的政治现实而言,构筑东亚史观究竟可行与否,因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前途尚难测。但从欧洲走向广泛和解的路径和结果来看,能否实现对相关国家困扰已久的历史问题的超越,取决于东亚史观之比重甚大。兹事体大,换言之,东亚史观之建构本身,也许就意味着该地区历史问题的消解。

[日]朝日新闻采访班:《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歴史は生きている—東アジアの近現代がわかる10のテーマ』),朝日新闻出版社,2008年11月30日,第一版。

BOOK REVIEW 书评

康诺利的反叛与回归

观察员 罗四鹤（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以改写经典童话故事而闻名的英国女权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曾说：“每一个时代都根据这一时代的趣味创作或改写童话。”在她的《与狼为伴》中，小红帽有着正常人的性欲望，大胆追求性爱，在危急中懂得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与坏人纠缠，以肉欲战胜狼性。在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唐纳德·巴塞爾姆笔下，白雪公主则成了家庭主妇，每天忙于打扫煤气灶和刷洗烤箱，后来竟得了性病，一个活泼可爱的童话故事解构成一堆毫无意义的碎片或者是被称为文字垃圾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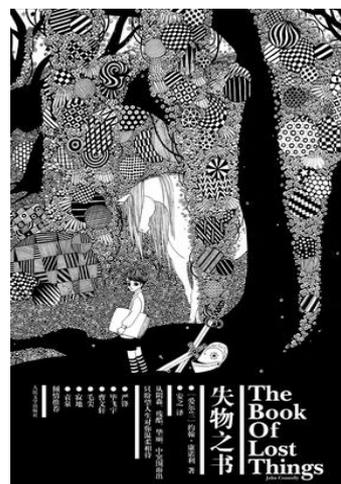
与这两位作家相比，康诺利在《失物之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中似乎走得更远。《小红帽》、《汉赛尔与格莱特》、《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罗兰骑士、守林人以及各种女巫等这些与人类一样古老的故事与传说，与专门收集孩子的罪恶进行交易而活的扭曲人和，同时住进了一座充满仇恨、追杀、欺诈、战争、饥饿、血腥、死亡的森林里：美丽的小红帽主动追求狼，他们生下的人狼怪物，成为森林最大的威胁；白雪公主是一位惹人厌的超级肥婆，七个矮人充满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整日杀气腾腾，意图嫁掉或是杀死白雪公主；足智多谋英勇无比的罗兰骑士是一位同性恋；被巧克力屋的女巫诱惑的男孩险些丧身，得姐姐搭救而逃过一劫后又重蹈覆辙；猎杀小孩的女猎人；恶搞的侏儒；血腥的城堡……几乎所有的童话和人物都与我们所熟悉的形象背道而驰，成为一个凶残邪恶的世界。

幸亏，这座凶残邪恶的森林只是一个迷失的孩子对现实的恐惧，只是一个失去了母亲、逐渐失去了一切的孩子戴维的恐惧。为了逃避现实，戴维躲进了书里，躲进了古老的故事与传说中。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故事是活的。这些故事通过戴维的阅读，进入了戴维的世界，开始支配戴维。在一次飞机轰炸之后，戴维走进了这些故事中，走进了自己的恐惧森林世界。在这座没有美丽童话的森林里，戴维逐渐战胜自己的弱点，用自己的勇气、正直与善良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孤独与自私，在经历几番生死之后，从一个孩子成长为大人。在认清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与森林世界中的位置后，戴维拒绝了与扭曲人做交易出卖自己的弟弟做森林的国王，毫不犹豫选择了回到自己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犹如扭曲人所说，是“痛苦、磨难与悲伤之地”，“你所在乎的那些人——爱人，孩子——会倒在路旁，你的爱也无法拯救他们。”若干年后，经历了大喜大悲、苦难遗憾的戴维再次回到了森林，这次，森林的土地已经发生了永久的变化，成为他梦中的天堂。

或许，每一个孩子心中都有一座这样的森林，或许每一个迷失的孩子长大成人都要经历戴维这样的痛苦历程。不过，康诺利给了这个童话一个美好的结局：沉浸在嫉妒、愤怒、孤独和忧伤中戴维最终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切失去的都又找回来了。

从这点说，康诺利似乎与安吉拉·卡特、唐纳德·巴塞爾姆相反，他对传统童话的改写不是为了颠覆或是反抗，而是回到传统，在对传统的古典童话进行颠覆反叛破碎穿越后，塑造的是一个新的古典童话：爱与宽容的童话。或许，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能完全理解戴维的恐惧与经历，却不妨先牢牢记住这个童话，直到长大成人。

[爱尔兰]约翰·康诺利，《失物之书》，安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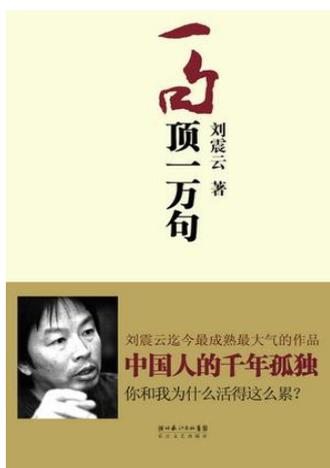
BOOK REVIEW 书评

一部废话构筑的肥皂剧

特约撰稿人 朱白(广州, zhubai@tom.com)

语言：一腔废话

如果读者有看过刘震云的访谈就知道了，这位刘老师不会直接说话，而是兜圈子，反复转圈子的过程就是绕弯弯，结果就是废话连篇。用哈里·法兰克福在《论废话》里的解释就是，当代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废话过多。而这里的废话在刘震云那里竟一次次地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形神合一。《一句顶一万句》，篇幅来看三十多万字，这三十多万字从哪来的呢？几乎每个出场人物都会有个小传，不是一点点，而是铺张起来的那种，这时候你说作者是怀揣着一个雄心洋洋洒洒地在书写一个族群的史诗也行，正如刘震云小说反复说的那样，一句话就看你怎么说了，有时候好话和坏话可以是一个意思。



一个人的个人简介，不是不能写成一个人的传记，问题是一部小说的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当成主角来写传记，就容易让人理解成凑字数。老范、老胡、老斐、老曾、老汪、老吕，等等等等，这些作用一般的人物都拥有一个完整的前世今生，这让我想到朱自清说的“废话”，他说：“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看来刘震云是把写小说本身当人生来过了。当然，作家写小说是一件非常自私的事情，小说在他的笔下可以任其摆布，我以小人之心地猜测，之所以会让每一个人物都拥有一部张嘴就来信手一写就是几万字的传记，还是因为作家的不自信，处理不好就多写点，这就跟射箭多射些总有不小心中靶心的时候，不是射术长进了，而是概率问题。停走的时钟，一天也有两次准确的时候。

刘震云对姓氏前一个“老”字的迷恋，令其不得不要为每一个“老家伙”都起一个姓，不得重复，否则“老”不起来，不混淆就只能为他们各重新起一个姓。这种形式看上去非常滑稽，难道是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的野心，非要弄出一个百家姓

来才过瘾吗？

如果我们阅读整部故事之后，针对这样一个普通百姓身上发生的阴错阳差的琐事，或许我还可以这样善意地理解刘震云的“废话”，它正是以一种恰当的形式来表达它所承载的故事核心，不废话，如何展示这一地鸡毛呢？

故事：一地鸡毛

不管序言中的“一出一走，延宕百年”这样的漂亮话多么激昂澎湃蛊惑人心，还得承认《一句顶一万句》讲的还是一个琐碎的庸常事，随时有可能在你我身上发生的那种凡庸小事和平凡人的人生。琐碎的事就证明是流入凡间的事，说明作家在说人话，这是《单位》、《一地鸡毛》沿袭下来的优良品质。这也是刘震云不同于所谓知识分子凌空蹈虚式写作的卓越之处。

当然，记忆好的读者还会记得刘震云也写过《故乡面和花朵》这样浩瀚、野心勃勃而又不得要领的作品，相比而言并从事后效果来看，刘震云不再去写《故乡面和花朵》继续《单位》、《官人》是靠谱的。但这样的转变当然不是余华从《河边的错误》到《活着》、《兄弟》的转变。如果非要把余华的《兄弟》拉上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作对照，我以为《兄弟》是余华对“平常”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追求，而《一句顶一万句》则在刘震云那里是一种天然的元素。

小说讲了几起杀人未遂事件，都是提着刀似乎在行动，然后在心里把要杀的人杀了一遍，这是中国人的狡黠或者东方智慧。狡黠的地方不在于想杀而未杀，最终只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在心里杀，而是在于当事人真的很生气，真的有了杀人的冲动，但包括他自己谁都知道这还不是一个杀人的事，经过杀人冲动、未遂杀人的过程之后，一个人的怒气也就消解了，用一个夸张放大的形式（即便是没有结果的表面形式）来化解自己的困境，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做人之道的精髓之一。

《一句顶一万句》似乎还有点市场上非常有卖相的“悬念”，两个离开的人（离开人世的曹清娥和离开婚姻的章楚红）均留下一句没有被传达出来的话，可能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产生寻找和等待答案的心情。但是这真算不上一个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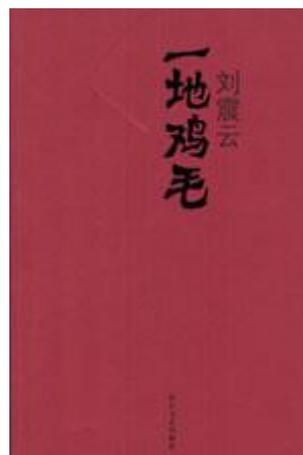
念，作家也知道这样隐而不见的话可以是任意一句话，只要没意义的废话，是什么都有可能，不说出来等于已经说了，如果真说了也是白说。说与不说在这里划等号，正是琐碎而一地鸡毛的生活的真相之一。

主题：百年孤独

小时候打架，如果对自己没自信，或者对对手感到恐惧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候，通常要拉上几个帮手，帮手不一定真的上去帮忙打架，而是站脚助威，从心理层面讲，这种帮手已经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不知道《一句顶一万句》的书脊上印着“中国人的千年孤独”，直奔着“十个百年孤独”的架势去的，是在玷污尚且在人间又极度跟中国版权较劲的马尔克斯，还是因为自己害怕了非要拉上一个帮手，总之，显得不是很聪明。如果按最新“大书”（从“大片”那新来的一个词）的“大”字来说，《一句顶一万句》只能是本“小书”，它的核心和内容所涵盖的仍然是个人的、短暂的、局部的、狭隘的。

按照作品的品质来说，《一句顶一万句》用来打发时间或者学学说俏皮话，可以，但直指人心或者让人找到共鸣的人性，都不太有效。刘震云将孤独总结为是因为“说不上”，感觉就像是小孩发现红绿灯是不停地变幻一样，还得扯起嗓门使劲喊出来，这有点让人抓狂，不至于啊，我还发现斑马线都是白色的呢。孤独源于“说不上”，这没错，小说中的杨百顺、牛爱国都找不到说得着的人，所以孤独，解决不了这一人生常态问题，就只能钻牛角尖，离家、寻找，救赎自己，刘震云用上下两部三十多万字来说这个道理，这些都没错，问题是这只是生活常态的一种答案，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之一，起不到让大多数人共鸣的作用。问题更是，这么大的嗓门喊出来，又不是孩子，至于吗？中国当代作家之弱，不仅仅是大家说的不敢面对当代问题、无力对当代中国发言，也表现在眼界之小、坐井观天的惯性上。



家族、孤独，是一个高山仰止的话题，前人摆在那里，如果不能形成与之有效对话，最好别碰，即便小心翼翼也容易出笑话。作家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是明目张胆地这样做了，杨家、姜家、牛家，还有更多的家族，“延宕”一个“百年”“孤独”的话题，这难免让人把《一句顶一万句》在所宣扬的形式上想到《百年孤独》。当然，还可以说成是成功的书商携作家本人在向遥远而伟大的前辈致敬。致敬，就变成了喜欢，喜欢便可以是一种人人都可以做、随时都可以做的事情了。但是，别忘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发生的致敬，往往也可以看成不靠谱的致敬，不仅是因为我们差的太多了，而是一个致敬也可以暴露自己的幼稚和离谱，比如被致敬的人明明是恐怖的，你非得拿自己的温柔向其致敬，尤其是给死掉的人致敬，难道不怕死人从墓地爬出来趴你家窗户吗。见过最幽默的致敬是前几年的恐怖电影《门》，片尾打出一行字幕：向希区柯克致敬！有影评人解读说，整部影片最有恐怖效果的就是这一句。

小说最后部分重复说了一句话：“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应该算是开解“孤独心灵”的一种办法，即便找到“说得着”的人，也容易一瞬间转变成“朋友的关系叫危险，知心的关系叫凶险”，所以只能不去解决孤独本身，而是着眼于孤独之后的其他生活。此时的牛爱国，基本沿承了鲁迅笔下的“阿Q”和钱钟书那里的“方鸿渐”，他们的回避精神将支撑他们的生活。可是当我们“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时，忘记的是“现在”，“现在”怎么打发呢？这跟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所面对写作题材时采取的态度是一致的，没有现在、忘却当下，或吟唱历史，或粉饰生活，或凌空蹈虚刻意忽略身处何地，总之没有跟你我有关的当下生活的存在余地。

在号称“延宕百年”的这部小说中，我们没有发现故事里有那些不可忽略掉的历史的存在空间，敏感或者脆弱不堪的那几十年，我们的作家都巧妙地侧身躲开了。历史背景在小说中仿佛就像不必存在一样，没有言语的历史依托，空空的一个“说”能成立吗？贾樟柯在《小武》、《站台》中反复使用年代音乐，甚至某段电视新闻片段作为背景，就是在告诉我们自己身处何处。尽管故事的历史不是你我的历史，但只要是人的历史，就会让我们产生共鸣。除非你讲的不是人的历史，否则纯粹的讲故事就无法单体存在。我觉得，作家们刻意回避和忽略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故事，是一种不自信和麻木，更是一种经过衡量后的狡黠。也就是说，我已经可以通过如此“安全”有效的方式达到我的目的，那么还用去冒险和做那些容易让自己乱了阵脚的努力吗？

作家：你叫 XXX

说刘震云是中国跟影视最近的作家，这句话不算错，但不准确。早年的《一地鸡毛》时，刘震云是跟影视离得比较近，那种以对白为主干的小说，非常适合改变成剧本，再加上刘震云的幽默的语言和世俗的故事，在哪个年代都会让编剧或者导演高看一眼。但他近些年出版的小说，《手机》、《我叫刘跃进》基本上算不上小说，都是有了电影才有小说，不管创作的前后顺序，至少市场上的卖点是因为同名电影的上映，这时你已经不能再称呼一个影视人为“跟影视最近的作家”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作家是一定要在文学圈占一个坑，才好拉出影视的屎。

其实在《单位》、《官人》的时候，我喜欢读刘震云，那时的刘震云有一种世俗的快感，即便兜圈子的叙述也是一种非常合适那时小说的一种形式，低调而平常的语言正好配得上凡庸琐碎的故事，人间常态的一种，刘震云写出来了。所以当看到刘震云在《桃花运》里的客串时，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次中国作家最极端、最凌厉的成功演出，那个带着娘娘腔一边向自己前妻示弱，又一边怨妇般抱怨别人是非的人，简直和我在看《单位》一直到现在《一句顶一万句》时产生的某些幻想太一致了。

近年出版的《手机》、《我叫刘跃进》，我相信买书的人都不是要看小说的人。到了《一句顶一万句》，我从头到尾地看了，很失望，因为失望也说了很多刻薄的话，用狠毒来形容也不过分，不是无名小卒的我虚妄，而是作家虚张声势的形式恰好冲淡小说唯一有点那么一点意思。综观《一句顶一万句》，总结下来不是作品有多差，而是读这样的作品让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厌烦，肥皂剧的本质却要打着好莱坞史诗来卖，不厚道。语录式语言，教唆犯般地对人生指手画脚，仅凭这些就容易让人想起台湾作家刘墉。不能上当受骗来形容这次阅读经历，但至少小说没有想像中的好，甚至也没有想像中的差，更谈不上“最成熟最大气”（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我们作家的其他作品还指望有人看吗），我实在想不明白作家本人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出卖自己。能多卖几本书吗？如果真能多卖个几十万，倒是好事。刘震云代表的那一代小说家，基本看来已经全军覆没，不再拥有年轻时的嚣张形式和真切内容，留下来的野心倒显得越来越明晃晃和不靠谱。不停尝试，不断经历，年富力强显示出一副在路上劲头的中年作家，在我们的华语世界里，有吗？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

刘震云：《一地鸡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

刘震云：《我叫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

BOOKREVIEW 书评**小天使在看着你**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我的电脑上贴着一张贴纸，上面有一行字：“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第一次看到这种贴纸，很是意外，没想到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名言“老大哥在看着你”会出现在小朋友玩的贴纸上，真是民智已开。出生于1948年的《一九八四》，经过60年，影响力直追小说中的老大哥：“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在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101位最具影响力的虚构人物》中，老大哥屈居第二，仅次于香烟广告“万宝路牛仔”，名列亚瑟王、灰姑娘、浮士德、芭比娃娃之前。

绝大多数预言的成功，表现在它们最终成为现实。《一九八四》的成功，表现在预言无法成为现实，在《一九八四》广泛流传的地方，老大哥要么无处容身、要么风声鹤唳，在《一九八四》未能抵达或者虽然抵达但是未能普及之处，老大

哥总是在看着你。不能说奥威尔决定了未来，但奥威尔看到了未来，他通过虚构的小说对可能的危险进行免疫，他通过对老大哥的想象阻止现实的老大哥，这与疫苗原理类似，接受微量的病毒，唤起免疫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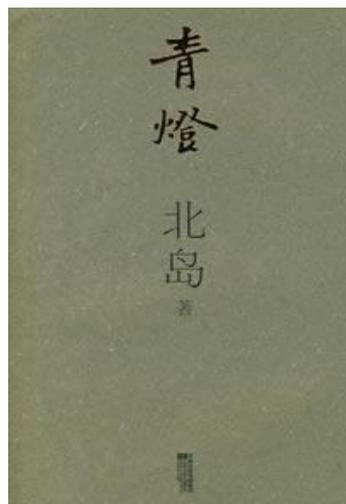
具有免疫功能的不仅有预言，还有记忆，一个指向未来，一个关系既往。人类天生拥有记忆和遗忘的能力，对于个体来说，记忆和遗忘需要达成一种平衡，失忆是可怕的，不会遗忘也是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记得一生中每个时刻发生的事情，他很有可能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会有忘川之水的说法，宁可遗忘，也不愿意记忆。但是对于国家或者社会来说，记忆需要超越遗忘。一个人失忆，可能会很幸福；一群人失忆，一定是一场灾难。一场地震之后，幸存的个体完全有权选择遗忘，这是自我治疗的最好方式；承担记忆职责的是国家和社会，它们必须把地震的每一个细节写在历史里。问题的悖谬之处在于，国家和社会是抽象的，承担集体记忆的是一个一个个体，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

一场全民的精神浩劫之后，如何对待记忆，成了一个难题。章诒和的《卧底》（2009年4月2日《南方周末》）引发的反响，可以用精神地震来形容。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精神浩劫之后的余震。

冯亦代，朋友眼中的“好人冯二哥”、章诒和眼中如父如兄的“冯伯伯”、文化界公认的老前辈，居然是一个埋伏在民盟人士身边的“卧底”。情节之曲折，不逊色于《一九八四》，也不逊色于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章诒和得知此事，“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北岛曾在《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里转述冯亦代的一段话：“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北岛的感受是：“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冯亦代表示“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但是晚年的时候，他在《悔余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里泄露了“卧底”的秘密。根据《国家秘密保密期限的规定》，“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有特殊规定外，绝密级事项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事项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事项不超过十年。”不知北岛看过“解密”的此书此文，是何感受？

让人不解的是，《悔余日记》出版将近10年，很多人看过此书，要么没有什么反应，要么读出另外一重感受。郁风在《听风楼上七重天》（2005年第6期《读书》）里盛赞冯亦代：“读了他的《悔余日记》以后，才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不但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并热情无所顾忌地对党直言，如说：‘党没有摸着知识分子的心，有些敬鬼神而远之。’‘党外同志不被信任，好像对待资本家，利用、改造，我们则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这本书是冯亦代二哥在一生中最苦痛的日子里的独白。”郁风的先生黄苗子，在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2009年3月19日《南方周末》）里同样有“卧底”之嫌，因为有这重关系，这里对郁风的文章存而不论。

《悔余日记》的整理者李辉，在“整理说明”里这样写道：“冯亦代的这些日记，详尽地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分子后的日常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读书情况和心理活动。从文字看，颇为真实可信。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紧紧交织地一起，凸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形象。同时，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他们中间有费孝通、潘光旦、陈铭德、邓季惺、章伯钧、罗隆基、丁聪、储安平、浦熙修、董乐山等，这也就使《悔余日记》成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片断的写照。”这段文字值得寻味，“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使得冯亦代成为一个单纯的受难者、“一个知识分子弱者”，这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冯亦代不仅是“被改造者”，还积极、主动地为组织改造他人做出贡献，不仅“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还将这些往来情况在第一时间汇报给组织上的同志。在广州的公众论坛上，李辉强调“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如果“客观冷静”得如同这份“整理说明”，就很容易成为对历史的另一种“情绪化表达”。



经过一场精神浩劫，几乎每个亲历者都在“示弱”，说自己是受难者，是个善良的好人，因为受难而崇高，责任被归咎于体制和魔鬼（“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这是一个完美的解释圈套，既表达了正义感，又无需承担责任，被指控的体制和魔鬼往往是死老虎。二战之后的艾希曼、《朗读者》里的汉娜，都使用这个逻辑为自己辩护。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知识界与他们一起分享着这个逻辑。试图打破这个解释圈套的成为“公敌”，虽然章诒和在文章结尾表达了和解的意愿，明确表示“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她依然遭到种种指责，诸如只看到一个指头、没看到九个指头，诸如亲者痛、仇者快，诸如不同情弱者，章诒和不得不撰文《我没错》为自己辩解。批评者通常以宽容为由，批评章诒和苛刻，既然可以宽容冯亦代，为何又要对章诒和如此苛刻呢？我不解。

有一种观点是，如果我们处在当时那种境遇，所做所为未必超出当事人，所以我们要同情地理解历史中的个人。汉娜就质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句话很有杀伤力，却经受不了仔细推敲，它把行为尺度视为价值尺度，这等于于是把当事人的行为全面正当化。这种辩解试图让自己的行为和价值统一，但它不是让行为追随价值，而是把价值降低到与行为一样的标准。相比之下，我宁可认同精神分裂者，即使做着无法认可的事情，并不因此把行为正当化，宁可价值尺度和行为尺度发生分裂，也要坚持价值尺度这个维度的存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与其“以卵击石”，不如老老实实地做“红旗下的蛋”，这是很多人面对现实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不等于无可非议，更不等于两种选项在价值上可以被等同。2009年2月19日《南方周末》曾经刊登一篇《直立行走的水》，讲述“顽固右派”刘衡的经历，她始终不肯交代罪行，不肯承认自己是“右派”，甚至在被威胁活埋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精神浩劫之中，个人是否完全成了螺丝钉，没有自我选择的空间？从刘衡和冯亦代的经历可以看出，并非如此。两者分属两端，更多的人属于两端之间的中间地带，如何评判时势中人？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标准。首先，看当事人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标准要严于其他国民。知识分子经常批判国民性，既然如此，就要起到带头模范的作用，不能遇到非常状况，就退避三舍。其次，看当事人是被动妥协还是主动妥协甚至主动邀功。郭沫若是受害者，儿子死于非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有独立人格，在这个方面郭沫若显然弱于陈寅恪。冯亦代的“卧底”，不乏积极主动的成分，为了提高业务水平，认真研究《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等书籍，这不能单纯地归为“被胁迫”；再次，看当事人事后有无反思。从这一点来说，晚年以巨大的勇气坦白“卧底”机密的冯亦代，要比那些至今或者至死严守秘密的“卧底”值得尊重。

和解是必要的，但是和解的前提是真相，这样才能促成反思，否则只是遗忘。个人可以选择遗忘，国家和社会不能失忆。但在集体失忆的情况下，个人记忆的作用更加重要。可惜的是，目前围绕《卧底》展开的争论，主要限于是否需要旧事重提的层面，这使得反思浅尝辄止。比如秋风在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联想起此事：“那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参与者，也成为他们自己所诱发的劣质化政治的牺牲品。黄苗子、冯亦代们的告密行径，正是他们的老师发动的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之一。”虽然我认同秋风的很多观点，但是他的这一反思过于简单和仓促。你可以说“卧底”是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我也可以说它是传统的后遗症。不过，我并不同意把“卧底”完全归咎于历史，这就像归咎于体制和魔鬼一样，忽略了个人在具体事件中的作用。

由于缺乏反思，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卧底”以各种方式存在。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曾经推行“小天使计划”，每名同学都是“小天使”，暗中关注一名“守护对象”，每名同学也都是“守护对象”，被神秘的“小天使”暗中关注。“小天使计划”提醒我们，“卧底”有时不是恶魔，而是天使。拒绝成为老大哥的小兄弟，需要的是勇气；拒绝成为小天使，需要的是判断力。天使也会犯错，何况“好人冯二哥”、如父如兄的“冯伯伯”？为了唤起免疫机制，奥威尔编织了一个虚构的预言，没有谁指责那是谣言；章诒和复述了一个真实的事件，让我们充分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劝告我们遗忘或者忽略呢？冯亦代毅然公开了个人记忆，遗忘或者忽略不正是对冯亦代的不敬么？我们为集体遗忘而感慨，为何又要拒绝个人记忆？个人记忆不是正在唤醒集体记忆么？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傅惟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4月；

北岛：《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

BOOKREVIEW 书评

时空交错下的“张冠李戴”

——评许田波著《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特约撰稿人 羽良 (北京, priestliu@gmail.com)

不久前,美籍华人学者许田波所著《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下称“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引进出版。该书曾于2005年获国际关系学领域权威奖项埃德加·福尼斯图书奖(Edgar Furniss Book Award),并于2006年再获美国政治学学会国际历史和政治 Jervis-Schroeder 最佳图书奖。该书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受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本融合了比较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著作,《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的问题源起于作者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政治学家和欧洲问题专家视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现象为理所当然,而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却视中国的强制性普世帝国为理所当然。可能是受到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有关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历史著作的极大影响,许田波在解释中国为何能自春秋战国时代后一直保持着统一国家形式这一问题时,首先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56年-前221年)理解为类似早期欧洲时期(1495年-1815年)的“多国体系”;随后提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与早期欧洲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二者对于国家发展和国内体制改革的影响有着相同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解释为何中国最终走向有着强国家传统的统一集权国家形态,而欧洲却最终催生了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和分权政治体制,许田波提出了“自强型改革”与“自弱型权宜措施”的概念,用以解释国家形成的不同走向。此外,许田波试图证伪华尔兹(K.Waltz)等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学者所提出的“均势政治”理论,认为国家间均势制衡的存在程度

依赖于国内政治改革的效果,换句话说,一旦一国通过国内政治改革极大增强了国家财富和战争动员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完全有可能打破国家间的“均势”,开始大规模领土扩张并导致统一。而许田波所赖以支撑其结论的例证,便是秦国最终灭掉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

在笔者看来,《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的积极意义在于,尝试着广泛应用社会科学方法重构中国历史,并得出相对具有实证意义的结论。同时,作者在书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国内政治决定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谈判能力”,而这种强调国内政治的国际关系理论主张,在今天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普遍奢谈国家“软实力”,奢谈大国崛起,无视国内政治危机日甚的情况下,显得尤其有益。

但是,许田波在对春秋战国时期与早期欧洲时期进行比较历史分析时,犯了大量概念上“张冠李戴”的错误。其牵强附会程度极大的曲解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封建国家形态,以至于《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虽然极富启发性,但却禁不起严肃的推敲。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所见,目前对《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最富洞见的批评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战争及国家形成〉》)。笔者无意复述赵鼎新先生对该书方法论上的批判,只就概念上的“张冠李戴”做一些简单的质疑。

事实上,《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理论的前提,在于预设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与早起欧洲时期情况相同的“国际体系”,基于此,许田波照搬了蒂利提出的“战争的压力迫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就战争物资进行‘谈判’,并就此推进公民权发展”的结论,套用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行政改革上。得出了以下结论:“为了动员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三类国家—社会交易:一是言论自由,这一点被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证明;二是获得公正的权利和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的权利;三是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政策方面的经济权利。”

将春秋战国时期比作“国际体系”,并非一个不可接受的预设。但将这样一个“国际体系”下割据的诸侯国当作“主权国家”来处理,就十分不妥。严格来说,“主权”概念只是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后才出现的概念。在封建时代的绝对主义国

家中，“主权”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即便是套用，也会发现“主权”对于解释古代国家史并无任何用处，相反，只会混淆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重大的差异。

其次，国内学界对《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中争议最大的一点，便是许田波提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公民权”问题。如前所引，许田波认为早期欧洲时期出现的“国家-社会谈判”在春秋战国时期也一样存在。但其实并非如此。如查尔斯·蒂利、T.H.马歇尔等社会理论家所揭示的那样，欧洲的公民权发展历史，是一部斗争史。公民权的每一次发展都伴随着国家与社会激烈的冲突、斗争，每一次进步都无异于国家与民众之间重新缔结一次“社会契约”。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不能存在这样针锋相对的冲突。相对于国家权力的增长，社会权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极为缺乏自我意识和组织力量。所以，百家争鸣的存在并不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言论自由”，因为在春秋战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各诸侯国并无明确的制度用以明确“言论权利”的存在，因此，也无所谓言论自由与否。相反，对“异议”的迫害其实普遍存在于个案之中，虽然找不到国家有计划的系统性压制异议言论（后期的秦国除外），但也完全找不到任何有意识的保护异议言论的做法。所以，对百家争鸣的存在，只能解释为当时国家权力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诸子百家”存在的意识形态价值，因此对各家宣扬各自学说做法，也只当成一种对政权毫无威胁的社会现象。一言以蔽之，那时中国并不存在“思想犯罪”的说法。在法制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上，许田波套用“公民权”概念进行解释，也存在着类似的错误。



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说到底，黄仁宇当年所说的“中国政治早熟”对于理解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由于政治上的早熟，国家权力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社会权力的发展。相较于早期欧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商人群体和普通国民，都没有发展出任何“阶级意识”，也压根谈不上“为权利而（与国家）斗争”。因此，诸侯国因频繁的局部战争压力而进行的国内改革，其实质，并不是“国家-社会交易”，而是彻头彻尾的“战争驱动的效率导向的国内行政改革”。至于这样的改革如何受到改革前社会结构的制约，又如何形塑改革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则需要认真分析，很难一概而论。因此，《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所提出的“自强型改革”和“自弱型权宜措施”并不是一个解释力很强的说法。恰如赵鼎新在批评许田波论述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概念不能解释为何在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出现了几千年稳定不变的儒家国家大一统形态。

《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虽然极力学习查尔斯·蒂利对欧洲历史的分析方式，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作者对现成概念的套用兴趣扭曲了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本该具有的历史感，给人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当然，该书所要论述解决的问题，针对的并非春秋战国历史本身，而是意在破除国际关系理论中均势制衡观点的错误和漏洞。因此，该书的创新性和启发性不容忽视。

[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4月，第一版。

PHENONMENON 万象

后门

特约撰稿人 汪伟（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最近国内最火的一本书本来只是“内部使用”——不过可不是什么内容火爆的禁书，而是北京城管的内部培训材料。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三年前有人委托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本罕见的著作。据我所见，《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封面设计十分丑陋，上面还印着城管执法的标志 LOGO，更加增加了这种丑陋的感觉，至于书中的内容，称得上相当暴力血腥。

血腥的教材内容和血腥的现实相映照。最近一个关于城管的坏消息是深圳一位城管在他长期巡逻的地点，被一位小贩刺伤。万幸的是伤不致死。经过这件事，深圳的城管部门立刻引进了新的防刺背心。这自然不是深圳的发明。在深圳之前，已经有多个地方的城管投入巨资，购买了包括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闪光背心等等装备。

中国城市管理的思路，正坚定而决绝地朝着一个危险的方向前进。各地城管打死、打伤摊贩、拆迁户和普通市民的消息，不绝于报纸与网络，深圳这样的报复伤害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对此，城管的应对不是自我检讨，而是加强武装，公开倡言暴力。

城管肮脏的双手背后是指甲干净的市长们。以流动人口为主的低收入阶层的生存需求与一条整齐划一的街道发生冲突的时候，城市政府的长官们选择了暴力。后者热爱秩序和干净的城市，一旦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就本能地拨出一笔笔税款，试图将城管武装起来，以保证他们的战斗能力，甚至不惜以社会对抗和群体事件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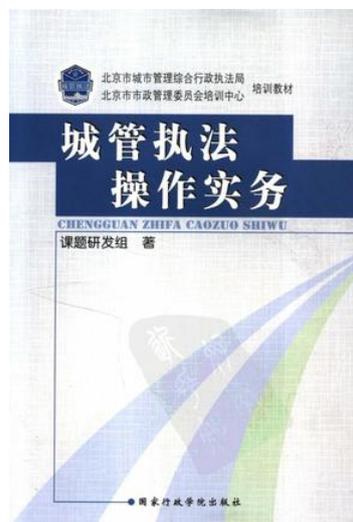
对熟悉中国行政体制的人来说，城管这个部门的存在是古怪的，它的设立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所以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也没有合法的编制和经费预算；它所负载的每一种行政权限，都已经授予给卫生、环保、工商、园林、规划、交管等部门。当初为了解决这些部门的扯皮行为，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集中行政处罚权，由此组织的城管部门本来是有中国特色的临时办事机构，但现在已经变成常设机构，不仅按人口总数的一定比例配备编制，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而且一直在通过游说全国人大，谋求自己的法律地位。

在法律之外运行的、以暴力为特征的组织，不管其目的是追求利益还是追逐权力，在通行的法律用语中被称作有组织犯罪，也即通常所谓的黑社会。城管的执法行为在法律之外运行，组织化的暴力倾向越来越明显，如果全国人大坚持不授予这个机构行政执法的权限，它们将成为合法存在黑社会。

而在软件行业，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作“后门”。编程高手常常有意在自己写的软件中留一个非法的“后门”，通过这个“后门”，他就能进入软件用户的计算机，控制他们在计算机上进行的一切活动。城管已经成了中国法律和行政系统中的“后门”，和软件业不同的是，这个“后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街道的众目睽睽之下运行着，除此之外，他们的暴力活动还经常占据报纸和网络的版面——因此，几乎没有哪个政府机构的口碑像城管这样坏。

但在城管滥用暴力这个问题上，立法机构和政府至今保持着心照不宣的可疑的沉默。北京警察学院教授关锋作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关键的撰稿人之一，写下了“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排比句，足以和东莞城管局长要求建立特警水准的城管应急分队相媲美。但显然没有人会为此事负责。关锋教授供职的北京警察学院是一家专门培养警察的专业院校，出版社所属的国家行政学院，主要目标是培养中高级公务员，但它们都不用对这本书中的内容负责，作为当事人北京城管局，也只是声明说“部分队员对当前部分媒体及网络对该书断章取义，针对个别词句和提法进行炒作的做法表示遗憾”，除此，他们甚至拒绝发表更多的评论。

对如此深广的民怨视而不见，坚持要留下这个治理系统的“后门”，或许只有一种解释能够行得通，那就是尽管城管进行的是一种非法活动，但是有利于政府控制社会。



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意味深长的制度安排很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拨款驱动准黑社会组织维持街面整洁,效率也许相当可观,但这种鼓励暴力的思路最终会导致暴力泛滥,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将因此而动摇,对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尽管是它要求地方政府集中行政执法权限的——来说,这种危机就会转化成治理的危机。一旦中国的城市街道成为暴力相对的战场,中央政府将失去对国家的控制。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6月。

PHENONMENON 万象

更加重要的概念被我们遗忘(节选)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其实我更愿意在 30 年的历史中回忆那些纷纷扬扬的商业关键词,因为只有这样的时间跨度,才能呈现出某种醒目的变迁。比如,我所了解的 80 年代,她的开头虽然是一种经济、商业的改弦更张,但人们的阅读显然不是奔着金钱而去,价值观,或者说是构建一种更加宽阔的价值体系,成为 80 年代商业阅读的核心任务。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记得《第三次浪潮》,阿尔温·托夫勒的作品,这种宏阔的著作,让更多的中国读书人惊出了一身冷汗,世界已经如此澎湃,中国人竟然还停留在一个类似于中世纪的窠臼里。



我想说的是,整个 80 年代的商业阅读史,基本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阅读。将过去的价值观解构,重构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成为有思考能力的读书人必须的工作。这正是那个年代解放思想的具体脚步。不过,当我们进入到 90 年代,这种对价值观的孜孜以求被人为阻断,人们的兴趣点被逼到技术领域。是的,现在看来,90 年代可能是一个技术转型的年代。更多的读书人从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思潮里抽身而出,进入了具体的技术领域。这几乎是中国读书人生存技术的一种转变,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相当应景,1997 年成为大多数读书人的案头必备书。历史的巧合可能就在这里。我记得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比如田溯宁、张朝阳,他们举着“把互联网带回家”的旗帜,回到中国,到 90 年代的末尾,数字化真的成了一代中国人的关键词了。信息、技术、数字和网络,将人们从那种泛政治的激情中拯救出来,人们不再沉湎于 80 年代的理想,市场和数字化成为这个商业时代的主旋律。

可能正是长达 20 年的价值启蒙和技术启蒙,当我们的步伐进入到 21 世纪,人们的热点再一次细分,所有人都一窝蜂地涌到了商业工具之中。我至今仍然对 6 西格玛、蓝海、红海、德鲁克、长尾等热门词语情有独钟,而眼下,人们开口就是企业过冬,就是奥地利学派,最不济的人,也会说起次贷危机这样专业的名词。新 10 年,毫无疑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具理性时代!整个商业史基本就是用一些新颖的工具来解读或者说是构建我们的生意与生活。

30 年的商业阅读轨迹竟然隐含着 30 年的宏大变迁,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不过,问题可能需要在这里提出,在这些曾经热闹或者是正在热闹的商业概念背后,是不是有更加重要的概念被我们有意遮蔽,有意遗忘了呢?

比如我,作为一个财经作家,现在我忽然意识到,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我或者是我们,对企业家的观察与描述,显然是过于草率了。尤其是对于一个中国媒体人,这种草率甚至接近了莽撞和狭隘。大概在我入行的头 2 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二元的心态在写作,仇富,或者是羡富。短暂的过渡之后,我被管理层面的工具理性吸引,比如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架构,甚至是财务分析,凡此种种的细节进入到我的写作之中。这样操作的结果,是渐渐远离了人的价值,当作为具体的商业现象,尤其是具体的企业家,他身上飘忽着的人性,以及积淀在他身上的历史被我视而不见之后,我想我差不多就成为一台枯燥的机器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这样的句子:

“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出发，追求的却是人类最大的福祉”。

这样的陈述像一道亮光，掠过我的内心。我相信我意识到了某种方法论：对商业的观察与陈述，不应该是一种管理学和成功学的路径，人们必须要走上经济学之路。而在我看来，经济学和其他的学科，诸如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一样，都是从个人出发，最终抵达个人。

最近一些年的经济学阅读热，其社会动机可能就在这里。由此，怎样阅读我们自己的商业史，就成为人们愿意思考的课题之一。我再次想起来黄仁宇先生的一句忠告：“放宽历史的视野”，关于商业观察，我们的视野一直太过狭窄，以至于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手，却看不到他的胳膊，看到他的鼻子，却看不到他的脸，或者说我们终于看见了他的脸，却又看不见他的身体，尤其是看不见他的身体四围环绕的空气和水。

由此，我对自己说，要做一个好的商业观察家，要对企业家进行深度的把握，首先需要建构自己的历史视野，其次需要形成某种学术方法。对于我而言，经济学及其工具当然是我热爱的方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事关人的权利与秩序的伟大学科。

当我带着这样的理念上路，我第一次看见了企业家的命运。曾几何时，这个世界对企业家的定义一直都是模糊的，人们把这个群体仅仅想象成财富的拥有者，想象成一种中国范式的“先富起来的人”。这种庸俗的欲望层面的定位，让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定位，更看不清企业家在市场逻辑链条中的动机和行为。事实上，即便是古典经济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也把企业家排斥在经济学框架之外，直到奥地利学派中的庞巴维克和米塞斯，才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只有以企业家为主导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才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家这个名词由此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社会结构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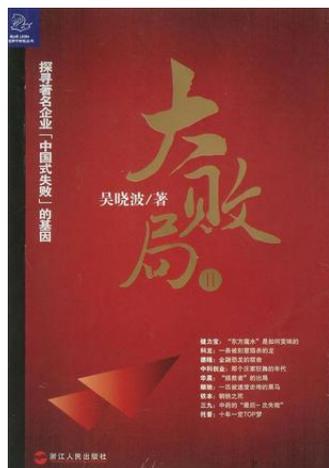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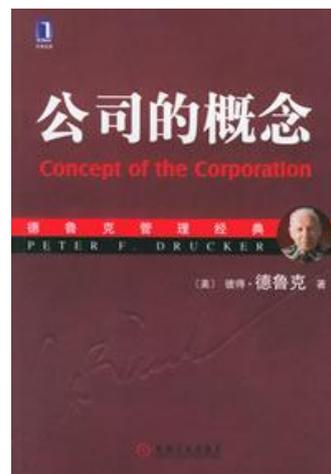
感谢彼得·德鲁克，感谢他的著作《公司的概念》，是他在管理学的层面提出了“企业是一个人文组织、社会组织”的观点，由此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不再仅仅与财富相关，企业或者是公司成为人类社会结构演变历史里的一个新向度，我们的社会从家族出发，越过民族与国家，现在来到了公司的门口。是公司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变得模糊。人由此拥有了一种新的属性，这就是公司人，而不再仅仅是家人，国人。

这一切的一切演变，都是企业家在背后用力。所以，我愿意提起吴晓波先生的《大败局》，今天看来，他的系列写作，真的是从一开始，就有了某种写作高度，由此，这样的书 10 年来继续洛阳纸贵，就是一件容易理解的商业阅读现象。

我是如此热衷于沿着这样的向度上观察商业，观察企业家，尤其是中国当代的企业家。我希望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的价值，希望他们的动机与行为，不仅仅让一部分丰衣足食，而且能彰显出一种新人性，一种新范式，一种可以复制，可以共享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一种普适性的探索精神。

我相信解决了这些问题，接下来几个事关企业家属性的技术维度，就可以看得清晰了。

比如产权维度。一个企业家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产权要素是我们必须叩问的门槛。一个没有产权属性的企业家，要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一个执行者，要么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官员，这样的人不是企业家，他不具有配置资源、组织行为的权柄和能力。



比如自由竞争的维度。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里发力，他不应该依靠垄断的手段来管理企业。如果垄断是他工作的砝码，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的企业家，不过是政府利益的食客。

比如核心技术的维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渴求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否则他可能就是上游技术方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依靠密集型的人力赚取血汗钱的一个加工厂，他将不是一名好的企业家，他可能只是一个生意人，他的上游太具有依赖性，而他在下游，又不具备市场的附加值，如此，他就可能是短命的，夭折的，他将不可能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是的，这正是我想说的，产权、竞争、核心技术，这些更加具有经济学意味的商业概念可能被我们忽略了。没有这些新概念的建设，其他工具性的操练，几乎就等于是无

本之木，无源之水。

这是一种崭新的商业维度！我的意思是说，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们的商业史已经具有比较周全的阅读维度。80 年代的价值观念启蒙，90 年代的技术革新，新世纪的工具理性，加上我们正在讨论的产权制度、自由竞争范式和核心技术、自有品牌研发，这成为我们阅读和思考中国商业史的成熟模型。

[美] 德鲁克：《公司的概念》，慕凤丽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3 月；

吴晓波：《大败局 II》，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 4 月。

ESSAY 随笔

一个钢琴家的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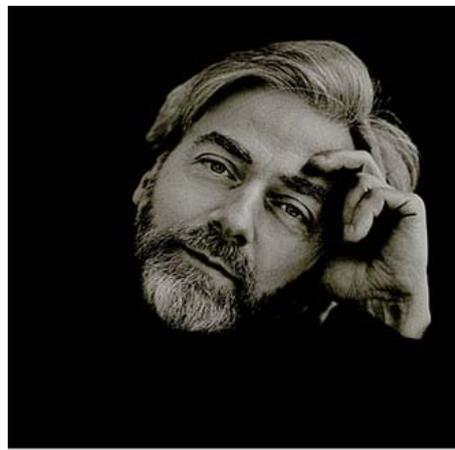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在西方古典音乐圈里，虽然不乏政治激进的艺术家的，但是在现场演出公开发表政治立场的，却是屈指可数。最近波兰钢琴家齐默尔曼却公开发声了，在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举行的独奏音乐会上，当时他正准备演奏最后一曲，但是他却沉默了一会，然后起身面对观众，缓缓说道“你们不要染指我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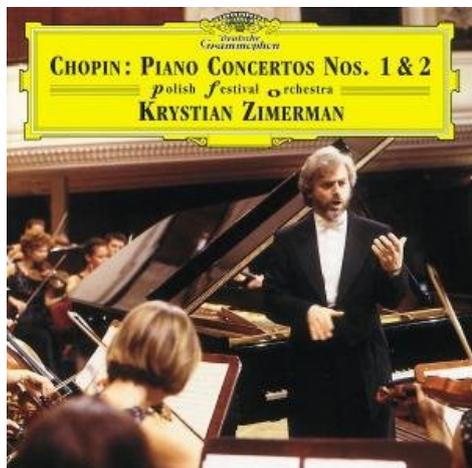
齐默尔曼抗议的是美国最近在波兰推行的反导防御计划，他在当晚用低沉的声音批评了美国的军事输出和布什外交政策的延续。奥巴马的上任本来让这位长期批评伊拉克战争的钢琴家兴奋无比，但是如今情况依旧，齐默尔曼站了出来，宣布永远退出美国的音乐巡演。

而在之前，原定他会在波士顿举行一场独奏音乐会，已经订票的我却被告知，齐默尔曼因病取消，如今回想，其中或许另有隐情。齐默尔曼与美国的爱恨情仇，远非政治一事。9.11 事件后，他那台准备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的钢琴在肯尼迪机场被没收，理由是上面的漆味疑似爆炸物。对于齐默尔曼而言，这无疑晴天霹雳，因为他的键盘和音锤经过了特殊改造，换琴对他而言，几乎是一个钢琴家的噩梦。从那之后，他每次巡演，都将钢琴大卸八块，到达目的地后自己再组装起来。

这种不愉快的经验到底对于齐默尔曼的反美情绪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未必清楚，但是他对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不满，却是明确的事实，他甚至一度宣布，假如布什不下台，他就不会来美国巡演。但是奥巴马的上任也没有挽留住这位



Krystian Zimerman © Kassara/DG



钢琴家，一脉相承的军事政策最终让齐默尔曼的不满爆发，发生了洛杉矶那惊天一幕。

音乐家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并不少见，曾经和齐默尔曼有过精彩合作的指挥家伯恩斯坦，就曾经因为激烈的反越战立场而被 FBI 严密监视。而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更是二战时期艺术家的道德偶像，以鲜明的反纳粹态度而为人所知。二战结束后，他更宣布不再去一些对与纳粹有暧昧关系的国家演出，此举甚至让托马斯·曼都写信表达钦佩之情。

不过回到齐默尔曼身上，我们却不得不不要考虑到他的波兰人身份。以音乐表达政治诉求，对于波兰音乐人而言，存在着一个隐秘的谱系，从肖邦的“鲜花里的大炮”，到上世纪初的钢琴家总理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一脉相承。为何波兰音乐人有如此强烈的民族情绪与政治表达欲望，或许与波兰的民族国家焦虑感密切相关。

就拿肖邦来说，这位被波兰人奉为爱国英雄的钢琴诗人，虽长期身在巴黎，身边环绕着文化圈的名流文士，但是他的作品却仍然带有强烈的波兰民族性格。那是一种对故土的强烈留恋，一种对波兰人长期受宰制的命运的忧伤，因此忍耐与斗争成为波兰民族性格的主要特质，也才会有肖邦那为人熟知的隐喻“鲜花里的大炮”。他以一种贴近波兰土地的音乐形式来表达对一个民族精神的召唤，呼唤起波兰人的集体认同，这种艺术与政治的结合，无论是否需要反思，但却是现代民族国家运动奔腾不息的源泉所在。

肖邦没有看到波兰的复兴，他所面临的是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后的残破格局，波兰作为一个国家，消亡了123年之久。而帕德雷夫斯基却等到了波兰复国的历史时刻，在一战后成为首任波兰总理，不过这位钢琴家总理很快退出政坛，重启音乐事业，只是二战却逼迫他不得不重新走上复国之路，担任了流亡伦敦的波兰事务委员会的领导者，但是他并没能等到二战的结束，对于这位钢琴政治家而言，波兰的多才命运，并未完结。

齐默尔曼对美国的抗议，我们固然可以理解成个人的政治立场，但是一旦回溯波兰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的民族命运，我们就会了解这种愤怒其来有自，那是对大国霸权的极端敏感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最终汇成一个弱势民族斩不断的精神脉络。

以钢琴演奏而言，齐默尔曼是这个时代顶尖的钢琴家之一，笔者也曾为其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所深深倾倒。今天回想，齐默尔曼能在浪漫主义曲目演奏上有如此之地位，或许是因为，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波兰人的那种民族情调还能与19世纪与20世纪的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接榫，而这种情绪，常人或许会斥为顽固守旧，但是我们或许要理解的是，在今日这个世界，强权与反强权，其实从未有一日消失过。

MAILBOX 飞鸿

来函 From 小谷 (nanqingyinian@163.com)

编辑老师:

您好！感谢您的辛劳，《独立阅读》09年4月号已于昨晚收到。

按着个人的阅读兴趣，4月号的文章我读过将近一半。

08年四月份我在学校的bbs上看到有人推荐《独立阅读》这份电子杂志，当时狂喜，它张开了我个人的阅读视野。之后各种原因，我并未做到定期阅读，现在电脑储存的只有08年4、5、6、7、10，以及09年2、3、4月号的杂志。

在读过今年4月号的文章后，心中有些许想法，想谈给编辑老师，这些想法或许会因为我个人阅读倾向而有所偏颇，不当之处还请原谅。

感性上讲，就我目所能及的几期杂志，若以时间为轴，最开始的几期读过之后我会很明显地体会到个人知识的增量。然而在最近几期，我阅读《独立阅读》的兴奋点在降低，而且一期读过所体会到的知识的增量已经不如从前。这其中可能有喜新厌旧的成分在里面，或者说是审美疲劳。我比较喜欢读文学、艺术、思想栏目里的文章（发觉栏目已有微调，如上所提栏目并不一定同时出现在一期里），而且也很欣赏作者个人的观点，比如凌越《作家的自恋》可以让人闻到很深厚的作者气息、是有节制的偏激。我想偏激也是喜欢写作或阅读的人较乐于走的路，每个人都会在思考的层面上向往极致。但人到达极致就容易出破绽。

下一点我想着重就我刚读过的4月号里的相关文章谈谈个人的看法，因为之前的阅读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们所留给我的印象不再那么强烈（还是十分感谢之前的文章所带给我惊喜，通过它们我直接或间接的在逛书店时有那么刻意的一刻，去注意在《独立阅读》里出现过的书籍，《博尔赫斯谈艺录》、《地下乡愁蓝调》、《失落的书》、《伪所罗门书》、《巴珑》等，其中对木心的书尤其偏爱，自从07年在书店发现木心，到今天广西师大出版的木心的书目，除去上面所提的两本，基本上已经读完，他的言辞或写作倾向虽有诸多不能苟同之处，但总体而言对他倾慕的成分仍是占了优势）。

09年4月号严格说来与我之前对它的设想出入还是很大的。这一期时事的符号出现的不少，荣智健、胡耀邦，降低了我的阅读激情。这与我经济或政治不太了解有关，当然，苏小和老师对官商结合利弊史的梳理思路是非常有意思的，读过之后我也很受启发。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一书，因为之前受“后辈人吃死人饭”观点的影响，在看到题目时就产生一种抵触情绪，这种自觉地反思抵触情绪并对之加以克服的想法我尚未付诸行动。虽然从另一面讲，这本书有可能改变

一部分人对前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同志的看法，对于我们这一批 80 后出生的人而言，胡耀邦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这不能排除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影响。如果给这本书设定一个意义，从作者的推荐语中我隐约觉察到，这将是为胡耀邦同志正名的一次努力，不过这个意义很可能是我个人的杜撰。

《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因为书名太宽泛，无新意，我没有看介绍；《历史大脉络》让我想起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虽然推荐人称这是“一部把中国纳入世界的历史”，《中国大历史》按黄仁宇先生的自述是从技术的角度讨论中国的历史，我还是没有信心去读这本书（《历史大动脉》），因为不确定这本书在我花时间读完之后我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差异性收获，所以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作者可以拓展推介的角度，将它与同时代或同类型的作品比较，以让读者对其有一更明晰的定位。

09年的《人物周刊》上看到周刊对阿多尼斯的介绍，应该也是4月份的，具体哪期我不能确定，购买的那本已被人掳走。这期看到对他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的推介，心中萌生了亲近感，有机会我会将这本书买下。他在《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这首诗里所用的象征手法迷人至极。

《贾想 1996-2008》一书先前已在书店见过。《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因为我本身就读的是法学专业，所以会有点反感这类“任意化”的题目，并且推介段落读下来，让我感兴趣的是“吴苏案”，而不是手记这本书。

《入殓师》、《朗读者》的介绍很有韵味。

书评我暂时还没读完。不过作者同是凌越，《勒克莱齐奥：永恒的漫游者》比上面所提的《作家的自恋》走远了好多。“中国人虽然普遍具有不好的阅读习惯”，“许多时候，人们热爱文学要远远超过热爱文学本身”，这些话虽有一定道理，但却值得商榷。对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更多的是需要依靠译者与出版界甚至媒体等多种渠道的通力合作才能达到，不能把责任一概推到阅读者身上，动辄就冠上国人怎样怎样的观点，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对于阿多尼斯，我同样是因为《人物周刊》的介绍才认识他。对于大多数国人，他们没有出国的机会，因此，认识西方的作家、诗人或其他学者，他们更多是凭借媒体的推介，图书的上架。当然，作者也提到了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自 1983 年国内就有出版社出版，但印数可怜，和者更是寥寥。但我还是不大认同，将勒克莱齐奥不被认知的责任武断地推给大众的观点。因为我本身没有在书店见到过勒克莱齐奥的书。加缪、萨特或者里尔克、福柯，他们被国人所知，起码说明国人具备吸收能力。但是不能因此要求人们对国外的所有具备文化影响力的人知之甚宽甚详。有遗漏是必然，即使被遗漏的比被了解的人更优秀、更有天分，我们不得拒绝事件的偶然性。

“人们热爱文学奖要远远超过热爱文学本身”。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应区别性对待。有的人可能喜欢抓文学奖的噱头。有的人可能希望通过文学奖认识作品，毕竟，独立阅读在推荐作品，文学奖本身也是在推荐作品。人们关注文学奖超过关注文学本身，总比人们连文学奖都不在关注，彻底冷落它的好，对这点，我抱有乐观态度，即便是很微小的乐观，我仍站在正的立场上。这好比诸多人批判高考的弊端，但高考却是目前选拔人才相对最好的手段。

所以个人觉得对勒克莱齐奥的介绍走得有些远，个人化的语言失掉了节制。

余下的，读得还不够细，即使上述文字，也是在头脑忽热时的一念。其中必定有走得远的地方，还希望编辑老师指正。另外，自觉阅读量还远远不够，在此大放厥词，实是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某些老师的话，还恳请原谅我的鲁莽与无知。

再，非常希望能有机会结识用心经营《独立阅读》的各位前辈。

小谷

2009年5月5日

回函 By 王晓渔 (wxy1978@hotmail.com)

小谷：您好！

您的来信已经发给“独立阅读”的各位作者，诸位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批评指正。因为我是这一期的轮值编辑，他们嘱我代为回复。

“独立阅读”从 2007 年 7 月创办至今，已有将近 2 年。这份读物本是兴趣所致的产物，不是作为一份事业来经营。我一向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人，向往“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所以，不仅您阅读“独立阅读”的兴奋点在降低，我参与编辑和写作“独立阅读”的兴奋点同样在降低。就在前几天，我还在琢磨是否要退出，再编一份让自己兴奋的新的读物。可是，“独立阅读”已经不属于创办者，而是属于各位作者，更属于各位读者。我骑虎难下，于是勉力为之。刚刚翻

看历史资料，发现《努力周报》只存在了1年零4、5个月，后期也是勉力为之，不禁心有戚戚。“独立阅读”和《努力周报》不能相提并论，可是看到前辈同样拥有“人性的弱点”，不免有些幸灾乐祸，同时为自己的懒惰寻找到一些借口。

信中的批评指正都很有见地，在此谢过。只是关于胡耀邦先生处，实在不敢苟同。对于胡耀邦先生的追念，绝对不是对于“明君”的缅怀。或许是此前的历史教育，使得您对于历史记忆避而远之，正如我们的政治教育，让我们对公共生活有了厌恶——我们以逆反的方式走向教育的目标。不过，我相信在随后的阅读中，您一定会重新关注那段历史。我一直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跟那段历史有关。

来信就像马刺，让渐趋慵懒的我们打了一个激灵，盼望以后多踢马刺。也盼望有机会相见。

我们想把来信刊发于下期“独立阅读”，不知能否惠允？

顺颂夏祺！

王晓渔

2009年5月8日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